

# 問題與研究

第二卷 第三期

五十一 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 本期要目

- 馬克思學派的太平天國史觀……………簡又文  
美國的期中選舉與今後的政治動向……………鄧公玄  
匪黨內爭之三大問題……………懷遠  
共匪經濟「調整」政策之意義與問題……………餘生  
古巴事件所反映的匪俄關係……………張棟材  
緬甸政局現貌……………吳越  
日本的自衛隊現狀……………朱少先  
最近匪日貿易關係之分析……………李明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 目 次

馬克思學派的太平天國史觀	簡又文	(1)
美國的期中選舉與今後的政治動向	鄧公玄	(17)
匪黨內爭之三大問題	懷遠	(25)
共匪經濟「調整」政策之意義與問題	餘生	(31)
古巴事件所反映的匪俄關係	張棟材	(34)
緬甸政局現貌	吳越	(37)
日本自衛隊現狀	朱少先	(42)
最近匪日貿易關係之分析	李明	(47)
蘇俄為什麼反對歐洲共同市場	呂律	(51)
蘇俄高級技術教育機關與國防工業專家	關素質	(54)
共匪對越南的陰謀活動	張耀秋	(61)
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	靈輝譯	(64)
動態述評		(67)
<p>○國際：①援助中國難民案獲通過。②文教經費我保持原比率。③聯合國報導我工業進步。          ④法國會選舉揭曉。⑤大西洋團結宣言。⑥美國期中大選。⑦韓國公佈新憲法。          ⑧琉球立法院大選。⑨日與北韓延長遣僑協定。</p>		
<p>○俄帝：①俄共中央全會與工農業生產。②加強社會科學研究工作。③俄對匪印衝突意見。④俄衣關係。          ⑤對外其他活動。</p>		
<p>○共匪：①匪日簽五年貿易備忘錄。②慶十月革命四十五週年。③對印度戰事停火並追求和談。          ④匪區工業動態。</p>		

## 十一月份大事日記

# 馬克思學派的太平天國史觀

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英文原稿）

簡又文著  
秩羣譯

## 壹 前 言

自從一八六五年太平革命運動失敗以後，詮釋此役的史觀紛紜其說，各從相異的角度來看這震撼清廷的偉大史事，或有代表着一個特殊的思想學派的。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把各家各派的史觀一一舉列或討論（註一），只是要提出其中一個影響最大的學派，加以批判：這就是馬克思學派。

當太平軍於一八五三年春攻下南京之際，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業已構成其經濟定命論的社會學理。當時，他擔任紐約「每日論壇」報的經常撰稿人。自那時起以迄其後的許多年中，他對於中國問題，尤其是太平革命的問題，深感興趣。他曾經發表許多篇有關中國問題的專論，其中有些句語是表示他對太平天國的觀點之作。自此以後，這些觀點遂成爲全世界馬克思的徒子徒孫們據爲解釋太平天國的教條原則。蘇俄歷史學家大體上曾採取這個原則，惟注重點則以時改變。中國共產黨、左派人士以及所謂「同路人」復步俄共的後塵，一致根據馬克思學說的原則，來解釋太平史。有些原來是反共的，但不幸陷身中國大陸的學者，也被迫改變其個人的意見，也許在經過「洗腦」之後，轉而附和馬克思學派的史觀了。更令人驚訝的是，由於紅色書刊大量湧出，不少非馬克思學派的中國歷史學者，甚至有著名反共的中外學者（姑諱其姓名和書名），不知不覺之間受其狂放的宣傳之影響，竟至全盤地或部分地依照馬克思學說來詮釋太平革命。

馬克思學派的太平天國史觀

馬克思學派的太平史觀，在學術界有這麼重大的影響和優勢，顯然地幾幾乎被普遍奉爲不辯自明的真理了。但著者對於這一派的學說，絕不認可，也不能苟同。在下文中，將首先把馬克思學派各家關於太平天國的著作摘要敘述，然後再根據個人四十多年以來從事研究這門專史所獲得的史實和文獻，而對各家的史觀，一一加以批判。

## 貳 馬克思學派的史觀

### 甲、馬克思

我們先從馬克思本人的史觀開始檢討。馬克思在好幾篇文章中，把太平天國革命與歐洲國家的革命混爲一談，並且屢發表意見，陳述其原因，界說其性質，詮釋其意義。我們無須乎引錄及討論其全文，祇須提出足以代表其史觀的兩段文字就夠了（註二）。

第一、馬克思以直截了當的方式說明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性質就是反封建的農民革命（註三）。此說已成爲其後馬克思學派解釋太平革命運動的根據。

第二、馬克思把太平革命與外國的帝國主義壓迫直接聯爲一起，以爲太平革命是英國的大砲所引起的，因爲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動搖了清廷的聲威，摧毀了老百姓對大清朝萬古不朽的迷信並打破了把中國與西方文明隔離的閉關自守的政策。我們將在稍後檢討這兩個觀念，看它們是否屬實。

## 乙、托洛斯基派

俄國的布爾雪維克人（共產黨），順着馬克思學說的思潮，對太平革命運動甚表興趣。有一位早期的史家名拉狄克（Radik）的曾經著過一本「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他的主要觀念是：太平天國的暴動隱藏着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成分的農民運動；因此，它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聲，有力的開端（註四）。

拉狄克這個觀念被左派分子（馬克思主義者或傾向馬克思的思想家）而同情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早期史家普遍引用，並且有意加以渲染。張霄鳴和李一塵都把太平天國視為「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註五）。後者更進一步以其為農民革命而帶有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色彩的。這是直接承襲拉狄克的思想的。李羣傑則謂：「在歷史上，太平天國是介在中國底中古和近代之間的運動。就其中古方面說；太平天國是最後的農民革命；就其近代方面說，太平天國是最早的市民革命。」他甚至以更為怪誕的文字來解釋太平天國，謂其為「市民性的農民革命，農民性的市民革命。」——他自詡上面說法「纔得其全，同時也只有這種全面的見解纔合乎實際，為太平天國正確的認識」。（註六）

被認為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學者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朱謙之，把上述各作家（包括拉狄克在內）都視為托洛斯基派。認為他們的觀念與原來的馬克思主義是大異其趣的，並且對這些不以根據史實的空想痛加指斥。上引李羣傑的最後一句，尤被其譏笑嘲罵，謂為「互不相容的怪誕的名稱」，實「難於了解」。至於朱氏本人，他對於馬克思原本的觀念感到滿足，即：太平天國祇是反封建的農民革命，並不具有資產階級和德謨克拉西的成分和色彩（註七）。

既然這一派作者不被視為正統的馬克思學派，所以，我們很願意讓朱氏對該派的觀念加以最後的評語，而在我們以後的討論中，將不再提及。不過，我們仍要討論朱氏本人的史觀——重新申述馬克思的學說——看其是否合乎他自己的標準：根據史實，不作空想。

## 丙、馬克思史達林派

回憶遠在一九二六年，著者會見了前來廣州訪問的一位俄國歷

史學者，他就是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的達林教授（Dalin）。由於彼此對太平天國史同具興趣，遂使我們聚首一堂交換意見。但因雙方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性質和中國社會中階級鬥爭的存在等問題，所見各異，遂使長達一小時的辯論終於在不愉快的分手中結束了。他堅決認為中國人民一向是有階級之分的（以馬克思所鼓吹的，普遍社會現象的經濟意義而言），而太平天國是由階級鬥爭而起的反封建的農民革命。儘管我引證了所有中國一般的歷史和社會證據，以及太平天國所特有的史實和社會證據，還是不能說服他和糾正他的不可救藥的錯誤的史觀（註八）。不過，從這一次討論中，我對於馬克思的「死硬派」之太平天國史觀有了直接的認識。

一九三〇年以後，這一個由達林所表示的正統馬克思觀念已變成了蘇俄官式太平天國史觀的主臬。但是，特別有關這個問題的學術性著作，許久未見發表。至一九四一年，有一本冠以「太平軍：偉大的農民戰爭與中國內的太平天國」的小冊在莫斯科出版。其作者為卡納慕沙（G. S. Kara Murza）。鄧嗣禹教授指出：「照該作者的看法，在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仍然停滯於封建主義時期（原書第三頁）……洪秀全所宣講的基督教義仍是觀念形態的偽裝，在其底下，隱藏着中國農民反對封建主義的抗議（原書第二十八頁）。所不幸者，太平天國諸王本身都變成了封建主義者……」（註九）。梅谷（Franz Michael）教授則認為這本書最足以表現蘇俄官方對太平天國的史觀，並以簡語擇要評述如下：

「依據他的史觀，太平革命是真正的農民戰爭，它具備了原始的平均計劃和烏托邦的理想目標。卡納慕沙連用了共黨官方的理論，以中國係封建社會，而且以為在事實上農民都是統治階級的田奴。因此，太平革命可與歐洲封建時代末期的農民戰爭相比擬。在這種革命中，中國的農民本身，絕不能消滅所謂封建制度的。正如真正的共產方式，卡納慕沙引述史達林的說法，以為正確史觀之決定性因素。史達林同志說：『即使在那些不以劫掠或無組織的情況下，個別農民革命，不能導致任何嚴重的後果。惟有在與工人革命相結合並由工人領導農

民革命時，農民革命才可以成功。」（原書第一三七頁）

「卡納慕沙指出，以現代的意味而言，中國在當時並無所謂工人階級，太平革命運動正是史達林理論的明證。太平軍會試圖建立保持烏托邦式的農民共產制度。」（註十）

直至一九四六年「蘇俄百科全書」第一版問世，始將蘇俄官式的太平歷史正式公布，解釋太平革命為中國重大的農民革命。在一九五三年印行的第二版中，又稱太平天國為「一次偉大的農民戰爭」和「反抗封建壓迫的王朝之革命」。此外，又採用上陳托洛斯基派狄克的觀點，承認其「德謨克拉克西的」成分。復次，在一九五六年印行的第三版中，「蘇俄百科全書」重敘馬克思的主要論點，稱太平天國為農民「革命戰爭」，並且強調，「苟無勞工階級的領導，農民便無力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如同梅谷教授所指出來的，這原是史達林最先所注重的論點（註十一）。

從上述蘇俄的歷史著作以觀之，我們可以總括而言：蘇俄官式的太平天國史觀，在要素上，係馬克思的正統學說。馬克思謂太平革命不是甚麼，只是反封建的農民革命。所不同者惟對某些特別注重點，則隨時稍加改變而已。

#### 丁、中國共產黨

為普遍了解中共一般的觀念形態（或意識形態）和他們對太平天國的特有的史觀，我們必須記得，他們是馬克思的忠實信徒，服膺他的社會哲學——即是、經濟史觀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從蘇俄那裏承襲了馬克思主義，因此全盤接受了俄共的太平史觀，如不是以俄共為媒介，便是接受其指示的（須知：他們稱俄共做「老大哥」）。他們把中國歷代的每一次民衆暴動，縱然是聲名狼藉的流寇或股匪，都美其名曰農民戰爭，為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生吞活剝地安裝於中國歷史中，使此主義成為普遍的和無訛的真理。因之，太平革命必須拿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而成為反封建的農民戰爭。這是今日中國大陸唯一的正統的史觀。凡是任何史家或作家在思想和言論方面與這個定論偶有出入的，即被指控為反革命，或思想不健全，結果必要受應得的懲罰，或要「洗腦」。在我們看來，中共之所以特別注意於歌頌太平革命，更不遺餘力地使這一段歷史，普及大

衆，家傳戶曉，其間實居心叵測，別有深意的。因為，他們要利用這個已被塗上紅色的歷史為宣傳工具，引誘讀者們於無意之間，間接從他們大量產出的太平書籍，吸收共黨理論與思想。他們把這次的重大史事視為中國現代農民革命運動中的第一回，企圖毀滅滿清治下的封建制度，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先驅。

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在大陸樹立政權。翌年適逢太平天國起義一百週年紀念。他們於是大事慶祝，在大陸各處和香港，均有特別的出版品，有太平文物展覽會，還有各種集會。此外更有超出普通宣傳作用的較為認真和實在的工作，如蒐羅編輯太平文獻，及印行圖錄和史料，發掘遺物等（註十二）。對於這些成績，有裨研究不少，學者們固然衷誠感謝，但他們對於每一條目和每一件東西甚至微不足道的一——必用馬克思學說的史觀來解釋，一味誇張和單調。例如：對於當時一塊石碑所刻的渡船規則，某王府上幾幅普通的壁畫，或某王爺在起義前所發出租田與農人收據，均一律加以「階級鬥爭」的解釋（註十三）。許多學者，則大為反對了。

中共著名史家華崗在紀念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百年時所出版的一本書「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註十四）對該運動作如下的描述：「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主要特徵是資產階級性的農民戰爭」。

#### （一）（第七頁）

「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歷史上規模宏大的一次農民戰爭，是中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先驅，是目前中國革命戰爭（意即共產革命）的前導。」（第九頁）

「太平天國革命開始就帶有基督敎色彩，但這祇是外表的形式，並非太平天國革命的本質就是宗敎革命。」（第十六頁）

「太平天國革命是反封建的農民暴動，是當時封建地主與農民矛盾的尖銳爆發。太平軍起義以前，中國社會正進到一個空前的土地集中過程。關於這點，王瑛在『太平天國革命前夕的土地問題』一文中，曾有詳盡的分析。他指出：當時，土地集中的程度很是厲害，擁有三千畝以上土地的地主，幾乎到處都有。在山西、河北、江蘇等省，甚至有萬畝、十萬畝、百萬

畝以上的土地……並引證各種資料，歷舉……十四省土地集中的情形，證明全國土地大約有十分之八是集中於佔農民人口十分之一的地主手裏，而佔農村人口十分之九的農民，卻只有百分之二的土地。」（第二十九頁）

除上述之所謂事實而外，華崗又指出，滿洲人入主中國後，強奪了中國人廣大的土地，而成爲全國最大的封建地主。後來，有些土地被分給皇親國戚，和滿洲兵將。如果上文所提的統計數字屬實，如果全國皆發生這樣的土地問題，則華崗及其他共黨史家所言，土地集中爲太平革命主要的社會和經濟原因，無疑地是正確的。而且，可以一般地證實唯物史觀至很高的程度。然而這種說法，在科學上是否站得住腳呢？我們稍後再作一次公平而仔細的研討。

再者，關於太平天國之思想和政策，華崗又作如下的解釋：「太平天國是民族的資產階級性的戰爭，其目的在求推翻滿清專制的統治，建立民族獨立的新中國。雖然太平天國的領導人物大半爲知識份子，且有地主富農分子與商人的參加領導，然而參加這一革命運動的基本羣衆，卻爲農民。……後來，太平軍進到長江流域等地，參加太平軍的廣大羣衆，還是因天災人禍而凍餓流離的農民。……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太平天國的主張和政策，主要的便是農民要求的反映。」（一九五頁）

「我們知道，一切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都以解決土地問題，剷除封建勢力爲首要的目標。因爲，封建的生產關係主要的就是依存於土地佔有關係上，不推翻地主階級對於土地的獨佔，廣大農民羣衆就不能從封建桎梏之下獲得解放。因而也就說不上民主革命的完整性質。在本書第三章中，已指出中國的土地集中於地主階級的過程，同時並指出許多農民由於喪失土地而日趨於貧困化，正是釀成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原因。所以太平天國在政治上的直接目標，是推翻滿清統治；而其經濟上的主要目標，則爲改革土地制度……」（第一九六頁）至於解釋太平天國何以失敗，華崗列舉了許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缺乏資產階級或無產（即普羅）階級的領導。這是附和史達林

以太平天國之失敗係由「缺乏勞工階級的領導」之論調。但是華崗自己另行舉出更多的原因。他說：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農民戰爭要取得勝利，必須要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如在過去法國），或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如在十月革命時代的俄國與現在的中國）才有可能。而且這裏還說到一般的革命勝利；如果進一步說到農民羣衆要得到徹底解放的話，那更只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意指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達到目的……在太平天國革命時代，不但後一種歷史條件（即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革命）根本還沒有蹤跡；就前一種歷史條件（即資產階級領導農民革命）也還不會具備，結果自然難免於失敗。」（第二一七—一七八頁）

中共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在他的論著中（註十五）顯出，他對於太平革命的重要史實和意義，確具有特殊的知識和見解，遠勝於任何左派史家。不過，他對於太平革命的性質所表出的史觀，根本上仍是屬於馬克思派的。恰如馬克思本人，他從來沒有直稱太平天國爲「農民革命」或「農民戰爭」——雖則他在說太平天國諸王多係農民出身，其目的爲土地改革時，曾有這樣的涵義。他的理論主要點是：太平天國是「新的人民反封建革命運動」（見范著「中國近代史」第九六頁），其革命的目的有二：打倒封建的剝奪者（即是以滿人爲君主的地主們）和帝國主義侵略者（大抵係指以鎗炮武力運輸鴉片入中國的英國人），因而增加人民的貧困。結果，無以爲生的農民只有藉武裝革命爲唯一的生路。范氏進一步指出：「可是太平革命軍與其他起義軍不同，它已有堅強的軍事組織，統一的宗教信仰，顯明的政治綱領，強烈的民族意識……」（范著「中國近代史」第一〇四頁）

談到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時，范氏卻很公平地承認基督教在形成太平軍的觀念形態中居於重要的地位。他甚至承認基督教爲他們的理想和政制的本源。不過，他仍然無法擺脫他的成見，以太平天國祇利用宗教迷信來適應客觀的革命需求。這種策略的運用可以喚醒羣衆團結在革命的大纛之下，類似中國古代革命勢力所利用的傳統方法。據他看來，這種謀略，意義重大。「『至聖』孔子竟被

看作邪神，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從基督教的源頭中，生出政治、經濟、民族和國際平等的思想，破壞了封建制度的精神和根基，兼把廣大的農民羣衆從難以忍受的壓迫和剝削之下拯救出來了。「剝去它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民主主義思想的本質」。由此看來，他也相信太平天國是民主革命（以上統見范著「中國近代史」第一〇五頁以下）。

在比較太平天國和古今其他的革命時，范氏接着說：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是有空前重大意義的。它不同於秦、漢以後任何一次農民起義，因為它破天荒提出消滅封建制度的土地綱領（指「天朝田畝制度」中男女均田）。它又不同於後來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意指國民黨，即一九一一年國民革命）。因為它敢於發動廣大農民參加戰爭，而資產階級則不敢喚起民衆。」（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論文集」第一頁范文）

這種論調使我們獲得他的結論：太平天國是新民主革命（意指當今的共產革命）的先鋒或前奏。而新民主革命在革命主義的每一方面均獲得了成功。（同上書第五頁）

我們不需討論有關此問題之其他紅色的論著了；因為，一般說來，它們都是重述或附和（響應）上文所引錄過的話，祇是於修辭重點和見解方面上偶有不同而已。這樣的例外就是最近（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一本比較具有學術性的著作；即是：牟安世的「太平天國」。他謂：「就思想根源來說，太平天國革命，是一個單純的農民革命運動」（第一九〇頁）。這種論調，是想要避免討論這個運動之兵員，和思想上的混亂。這真是一種更爲狡黠的方法。

## 叁 批判

### 甲、馬克思學說——總評

在一九四一年春出版的拙著「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中，我會對馬克思的太平天國史觀作了如下的批判：

「這是絕無確鑿的和充足的事實爲根據的空論。我遍尋一

馬克思學派的太平天國史觀

切可能有的史料，找不到太平天國內有任何資產的或無產的階級性或意識之存在（看下文按語）。不知他們究竟如何能斷定這是「階級鬥爭」？其他如「德謨克拉克西」也，「反封建」也，「市民革命」或「農民革命」也，都是了無痕迹可尋。」（頁一四）

「一般言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經濟定命論、或經濟史觀，實爲不健全的學理，尤其不能施用於太平天國史之解釋。是的，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中，即如人類生活中，經濟因素是佔着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然而不是唯一的，或主動的，或主治的地位。此外，推動或主治社會進化和決定民族命運的還有許多重要的因素。若只就物質經濟一點點來看歷史的全面，偏頗特甚，透視不準，必失真相。國父批評的話在學術上很爲精確：『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學家』。原來馬克思研究社會學之際，正當歐洲封建制度變遷及產業大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發達之時。當時社會上便有地主與佃奴及資本家與勞動者（無產階級）兩種鬥爭，所以他形成『階級鬥爭』之說，并推展此說而演爲社會進化的原則，寔假成爲普遍的永久的革命方略。殊不知階級鬥爭是一時一地一種民族中的社會病態，而非常態，尤非全世界各民族中永久的常態。硬以社會進化的病徵爲社會進化的原因，所以國父判斷其『倒因爲果』（亦即倒果爲因），並明白指出：『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故其結論稱馬克思爲『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社會生理學家』，自是的當。若其『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一語，更足攻破其哲學的根據——唯物主義——的壁壘矣。」（頁一五—一六）

這一派人承襲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奉爲永久的普遍的原則，隨時到處要實施之，而不問歷史背景、社會現狀，及人生

實際問題爲如何，是爲演繹的、非科學的做法。大凡一種社會理論，離開當時當地人生實際的狀況與需要，鮮不流爲抽象的、空洞的原則。若強以此抽象的原則實施於他時異地及種種不同的環境當中以謀社會的改進，其趨勢必至先行強造形勢而偽造需要，而後演證此爲匡時良策。這又何異於推銷特效藥者，先要設法使人們染了那種特別病症，然後投以此藥？而其實則是奉此對一時期一地域一種人之特效藥爲「萬應聖藥」(Paracea)，見病則投，以爲百病可治而已。至實施此抽象的原則於解釋一切的歷史中，尤其是太平天國史，則其流弊，不特要「削足適履」——所謂「遷就事實」(按：即「移史就觀」)，恐怕還要偽造歷史，務求證明此抽象的原則之爲萬古不易不磨的金科玉律。凡墨守先天的結論，而後求事實的證明者，全是非科學的，甚至反科學的做法」。(頁一六)

### 乙、駁議

四年以後，華崗在他著作中(即上引書)以毫不妥協的和公開挑戰的口吻對我的見解痛加詆斥，有曰：

「因爲簡又文是一個玄學歷史家(姑且承認他是歷史家)和形式主義者，缺乏歷史科學的基本知識，所以也就找不到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規律，以致他在『太平天國全史導言』裏，只承認『太平天國是民族革命』，而不承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更不承認『太平天國革命是階級鬥爭』……這真是沒有一點科學歷史常識的武斷，竟至連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這樣彰明較著的事實也看不見。我們除了敬佩簡又文的無知和大膽以外，實在沒有別的話好說」。(原書第四、五頁)

不過，這個作者在大罵我之外，竟然降尊紆貴地在拙作中找到「可取之處」。他說：

「例如『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一書，著者簡又文對於太平天國史料之搜求，不可謂不動，用於研究太平天國的工夫不可謂不多，……我們就他的得意著作：『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一書來看，則不能不說離開科學歷史的水準還相差甚遠。但『

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一書中所搜史料甚爲豐富，本書亦曾採用一部份，這是應當感謝他的。」(第四頁)

我相信，當華崗提出「事實」和「史料」這兩個名辭之時，他已找出正確史觀的線索；但是，跟不上他自己的標準的是他本人，正如所有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在我看來，馬克思學派之承認太平天國爲農民革命和階級鬥爭的史觀是不合理的和謬誤的，因其並不是以真確的史實和文獻爲根據，也不合乎歷史的事實。我在近著「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一書的「緒言」中，曾有如下一段文字答復華崗的批判：

「自從『首義史』問世後，我再經過十三年用功搜討與研究，再多讀了一百幾十種中西的原始資料書(包括神州國光社出版的八冊及國內新刊行的太平史料多種)，仍然找不到一些事實與痕跡或史料之稍可證明他們的太平史觀之爲正確合理的理論者。現在我向他們一面謙虛地請教——請其逐一逐二拿出真憑實據來，一面却勇猛地、不妥協地挑戰：像華崗之所謂『這樣彰明較著的事實』，究竟在那裏、那書可以看得見？究竟之，所謂『事實』，得毋是『理論』之誤稱或混亂？然而究竟又有何具體的真憑實據可以證明這理論之爲正確合理的？如其無也，則所謂『理論』簡直是毫無史料與史實根據，完全是符事實的空想、幻覺、謬論，假說，如斯而已」。(第肆柒頁)

又文按：上文(「首義史」導言)，見上文之甲)寫成三十年後，我仍未見到馬克思派各史家提出任何新憑據、新史料，以證明其太平史觀之爲真確。獨有一九五六年三聯書局出版之「太平天國起義調查報告」一書，提出一些有關太平軍起義時屬於經濟性的階級鬥爭、農民革命的資料，似可爲此派太平史觀張目。然細考其內容，則這些特殊的資料，皆是經過幾度的渲染而非元始真實的原料，殊不可靠。據其「前言」所述，先由「廣西省太平天國文史調查團」團員十人赴各處「從事實地調查」，爲期月餘。「所獲得的資料自然很多是間接的傳說，並且可有很多不完備的地方。」「回到南寧之後，由……(五人)整理原始材料。將原始材料整理之後，再參考必要的文件，分工合作，寫成調查報告書。」「調查報告書



初稿寫成之後，又由……（二人）作總的整理和修改」（見頁二、三）。可見所得的原始材料曾經兩度的「整理」及一度的「修改」。中間還有「必要的文件」之攪入，則其渲染色彩程度之深，不言而喻。復以前廿餘年余親到桂平、江口、新墟、金田及貴縣一帶調查探訪所得（統載「金田之遊」），試作比較、參證，則全無這些階級鬥爭農民革命的因素或迹象之可見可尋。當時余等問者與答者，及其後余編錄採訪所得，均無階級鬥爭農民革命一問題之成見在胸，故所得的一切材料信為一塵不染的眞確原始資料也。綜合觀之，馬克思派史家的太平史觀成立之程序是先懷有唯物主義、經濟定命論、階級鬥爭、農民革命之先天理論，乃企圖盡力發掘史料以證實之，如此已非科學的做法矣；猶復於得有些少「間接的傳說」的、「很多不完備的」材料之後，強將馬克思主義加以泡製，而成此經過渲染色彩的史料，最後再轉用此種史料以證明馬克思派的太平史觀之爲確鑿不磨的、亙古不易的眞理，來來去去跳不出「害惡的循環圈」（Vicious circle）。此更是反科學的方法，何能表出眞理耶？（以上一段係於校對時由「太平天國全史」一稿言「頁伍拾之四—五補錄，未載本篇英文原稿內。又文志」）

### 丙、馬克思的個人背景

本文以下的篇幅，將對於馬克思學派的太平史觀逐一致力於分析和批評，非爲好辯，實是站在學術的立場來從事研究。今再從馬克思本人開始。

要研究馬克思對太平天國的意見，我們必須考慮到兩點。第一，他的密友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致布洛治函中指出馬克思自從構成了他的社會和經濟理論、唯物史觀之後，「他很少寫出一種不含有這個理論的東西，不但『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不但『資本論』，即在論太平革命各篇，也都是這理論的應用上的一個非常輝煌的例子。」（註十七）由此顯見他已定立這個理論爲武斷（教條）主義的、先天的原則，復斷定可以施用此原則以詮釋世界上的一切歷史大事。最初，他可能是靠直接觀察當時的重大事件、實際的狀況和當時歐洲反社會現象，因而得到他的理論。是故，他的理論會被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但是，一自他普遍施用這一理論之時，他不

願別處的實際狀況和事實，而屈服於一條抽象的理論之號令之下。於是乎馬克思便陷身於他自己創製的理論牢籠中爲其囚徒了。換句話說，他竟成爲他自己的非科學方法之第一個受害者。

第二，馬克思從未到過中國。從他的作品內容觀之，很容易看出，他對中國的社會狀況、習俗、和歷史的知識，都極爲淺鮮，而且有些知識是錯誤的。例如，在「中國問題」（一八六二年）中，他說滿清統治中國已達三百年，其實在太平軍起義以前祇約兩百年。又，他有些誤信德國一位傳教士郭士打（K. F. A. Gutschalk）一八四九年從香港返回歐洲之言，謂所聞新近出現於德國的社會主義與中國許多平民最近所提倡的社會理論是完全相同的。郭氏從歐洲返香港後不久即去世（一八五一年），顯然他對太平革命所知無多。但其寥寥數語却掀起了馬克思的熱忱，並使他對太平天國的將來懷着極大的希望，因他或許被其誤導，並相信太平天國的思想與他自己的社會主義是兩相契合的（註十八）。關於太平天國，他再度照例引用他的先入爲主的原則，雖然他對於太平天國的確實事蹟、眞正的狀況，與乎種種政制文物和出版書籍茫無所知。處於這種情況下，他的太平天國史觀如何能入信呢？

今再舉一具體的例證。他妄說太平革命是英國的大砲所引起的。凡是熟悉中國現代史的人，尤其是生長在廣州的人（如著者），一定很清楚地知道，最先爆發於廣東省的鴉片戰爭與太平革命運動毫無關係可言。鴉片戰爭結束後許多年，太平軍才在廣西省山區起事。該地並不感受外人影響——雖然洪秀全和馮雲山籍隸廣東省。就我考據所及，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兩役之間的唯一關係是極其微妙和間接的，除非我們殫精竭力去追索二者之間一串大事的貫連跡象，否則幾乎是無法辨識的。事情是這樣：廣東清軍被英軍擊潰後，應清吏號召而攜械抵抗英軍的志願軍和民兵，不滿於喪權辱國的條約，拒絕解散。然後成羣結隊地淪爲河海上的海盜及陸上的股匪；經清軍追剿潰敗後，許多逃往隣省廣西，有的與當地土匪合流，有的則逕自橫行水陸。結果，廣西全省盜匪如毛，漸次變成了太平革命醞釀及長成的沃壤。太平軍起義後，曾有大股土匪投效，其中包括艇匪渠魁羅大綱。其人以後戰功赫赫，成爲太平軍名將，終於

壯烈殉國。鴉片戰爭後十年，太平軍始行起義。遠在歐洲的馬克思，對於中國當時的實況並未親眼看見，極可能是僅憑一己的想像力而遽作論斷，竟把中國現代史上的兩件大事混為一談，因此在邏輯上犯了以先後為因果的大錯。

如果我們說英國的大砲是助清平定太平革命的（因英軍官戈登在太平革命運動末期參戰助清，擊敗太平軍於吳中一帶，致令天京終於失守），比較說英國大砲引起太平軍起義，更接近事實。其實，引起太平軍起義應負大部分責任者，毋寧謂是首先由馬禮遜博士（Dr. Robert Morrison）傳入中國及繙成華文的英國聖經。因為馬博士的信徒梁發曾著了一部傳道小書以宣揚聖經，使洪秀全皈依了基督教。由此，洪秀全自信親受「天命」推翻滿清，建立太平天國，而授與無上權威者却是聖經。

#### 丁、太平天國是反封建的嗎？

說太平天國是反封建的，馬克思誠然是始作俑者。既然所有馬克思學派的徒衆都服膺這一觀念，我們儘可以他們全體為對象來作通盤的檢討。

對於這一觀念，我們有兩點反對的理由。第一、中國向來不是封建國家。如馬克斯所云：把高度文明的中國之社會狀態和文化成果比擬於中古歐洲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實在是一種污辱。第二、太平天國並不是反封建的。「中國現代史文集」（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Modern History）導論的作者們關於此點之觀察是正確而值得推許的：

「在我們看來，共黨道德劇中帝國主義的孿生姊妹『封建制度』，不一定是可以巧妙地施用於中國史中而理解得通的。朝這一方做的，有中國（中共）史家和作家們，努力產生了令人迷惑的全不調和的時代劃分法，妄將歐洲『封建制度』一名詞轉用於中國社會，顯然不當。除該名詞應用於中國史時所產生的制度上的模糊意義外……『封建制度』具有鄙俗的——如不是卑賤的——涵義，因為，它把作為亞洲文化中心的一千三百年的輝煌中國歷史，與歐洲『黑暗時代』以後和現代歐洲興起之前的幾百年歷史等量齊觀……接受這個外來的『封建制度』概

念，對於中國傳統的民族中心主義而言是一個打擊……但是，這個概念和中國過去的史實以及它的現代民族主義的情緒是否可以並立呢？（註十九）

我們的答覆是絕對否定的。我們暫且不談文化史和民族主義的情感，祇是就事論事。中國的土地制度是耕戶租田制的。的確，中國的殷富地主把田地租給貧農，後者以部分收成當租金繳付地主，正如房客向房東納房租一樣。不過，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古代歐洲封建制度絕對不同。中國的農民雖向地主租田而耕，但其個人身分及社會地位絕不致降為佃奴或奴隸。如逢收成不佳之年，他們可以要求緩納田租，或者要求減收。每遇急需，他們甚至可向地主告貸。簡而言之，地主並不是農民之具有生殺予奪大權的霸王（主奴之主）。我對於廣東所了解的土地情形是如此。我又曾在廣西省留居一年餘，所看見的情形亦復如此。因此，大凡認定太平天國是反封建的，這種看法簡直是大錯而特錯。

不過，「封建」這名詞在中國文字上另有一個意義，與西洋的概念完全不同。其義包括一切屬於往古專制君權時代的習俗、傳說、禮制、哲學、和文物制度等等。凡是古老東西之不適用於現代社會的，皆稱之曰「封建」，例如「封建思想」或「封建勢力」等等是（註廿）。中共史家們除引用馬克思的原始概念以外，動輒以具有這樣意義的「封建」名詞來解釋太平天國。但是，即使涵有此一意義，這個名詞仍不適於太平天國，因為太平天國的人物本身都是如舊一樣「封建的」；而且在某些方面，如觀念形態、個人志願、社會態度、政治建置、和文物典制等，甚至比他們的同時代人更為「封建」。他們對於古代各朝的文化遺產——尤其是三千年前周代的，極表崇敬。事實上，他們的政治制度，上自中央政府，下至鄉土地方政府，以及全軍的組織編制，包括官銜稱謂，大概都是模仿周代的。他們的社會理想和政治理想都是直接本着古中國的經典（最著名者為「禮運大同」篇）。他們的倫理制度，傳統上和要素上是儒家的，祇是禁止崇拜孔子為神兼刪除孔子遺教中之容許和提倡偶像崇拜的部分而已。

即使在他們的宗教信仰中，也把基督教的神與中國遠古的上帝

視爲一體。此外，分封諸王的稱號、賞賜文武功臣的勳爵、士兵們所企求的榮譽、官書中所規定的儀禮、以及科舉考試之重視，無一不是極端「封建」的，較之前朝，但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對於太平天國典章制度的研究，使我作此必然的結論：他們固然一方面施行革命的程序，甚至採用西方的宗教和物質文明，力圖建立一個「新天新地」（直接引用新約聖經啓示錄）；然而，他們同時懷着恢復中國傳統的固有的文化之崇高理想，以遠古的樣本作爲建國的模範，祇是凡與滿清攸關的一切東西，他們必要加以消滅。簡而言之，太平天國不是「反封建的」，祇不過是想以新的封建來替代舊的而已。

### 戊、關於高度土地集中問題

照華崗所引王瑛的記述，太平天國起事前夕的中國土地情形，的確似是封建的——雖然中國的社會狀態和政治組織與封建的歐洲仍然大不相同。他所提出的統計數字是「全國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集中於地主之手，這些人祇佔農民人數的百分之十，其餘的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祇擁有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按：王瑛原文指出全國土地有百分之四十至八十集中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少數人手中，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多數人則沒有土地。此見牟安世：「太平天國」一書所引。華崗顯然竄改原文。其比例數，祇指出其最高額和最低額，迹近誇張，大不誠實）。（以上按語未載本論文之英文原稿，係校對時補錄。又文志。）

前文中已經指出，華崗抓住這一點，而把它解釋成太平革命之主要的經濟原因。然而重要的問題乃是：這些統計數字是否可靠呢？就我所知廣東本省（也是洪秀全、馮雲山及太平天國其他多位王爺生長之地）的情況而言，這些數字是殊不真確的。照廣東人一般的做法，當其在本省或異地外洋經商營業致富後，即把所積蓄的金錢在原籍故里購買田地，租給當地農民耕種。這一來，出現了許多的小地主，故許多人擁有一地。當地主的子孫們把原有的土地遺產分割、再分割，代代相傳，一賣再賣。如是者經過幾百年後，土地集中於少數大地主手上的情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到了現代，人口增加了許多倍，但是土地並未出產足够的糧食以養活不斷增加

的人口。所以，王瑛的籠統說法顯然不能應用於廣東省；至少，沒有統計數字來證實他的說法。此外，有大部分的私有土地屬於公家的，所有人不是某族祠堂，便是某個社團，利用年終所得的穀租作爲祭祖開銷（所謂「蒸嘗」），或用於某種慈善或教育事業。處於這種情況下，洪馮或其他人等都沒有因此理由而興革命。

關於王瑛所描述的其他諸省的土地問題，他並沒有提出足夠的眞確的統計數字來證明他的結論。在王瑛發表了描述太平天國革命前夕土地集中的程度一文（爲所著全書之一部分）之後（註廿一）；有沈鍊之者，即爲文駁斥他，逐省逐省指出他的錯誤。例如，王瑛引用某書的記錄，謂：河北省（直隸）有五大富家擁有田地甚多，但這祇是含混而籠統的說法，祇說他們富有，並未舉出確實數字，尤其沒有說明他們的土地究竟佔全省耕地總面積的比例多少。又，王瑛指出在江蘇省，有姓顧的富豪捐獻鉅款，購買四萬八千畝土地，充作慈善事業之用。但他並未說明顧某是不是這些土地的主人，也未能證明顧某真是大地主。關於江蘇省土地集中程度更沒有資料提供。至於浙江、山西、河南和陝西諸省的土地集中情形，也沒有舉出確切的事實。關於湖北、山東和東三省的土地情形，他是引錄幾位外國傳教士的報導。除了大地主外，還有許多小地主，因此與他自己的集中論斷互相矛盾。關於江西、廣東、廣西和福建等四省，王瑛均未提出證據和事實，祇是籠統地說集中的情形很普遍而已。因此，批評他的沈鍊之結論說：

「總而言之，著者（王瑛）憑主觀的判斷來說明太平天國革命前夕土地集中的程度，毫無歷史的事實作根據，而且他所引的證據有許多是自相矛盾。所以我們讀了他的著作覺得非常失望。同時，不禁有點悲觀，因爲，如果歷史學者只務空談，不重實際，中國史學界前途是非常黯淡的。」（註廿二）

除以上的批評外，關於滿人集體或個人所擁有的大量土地，我們也可以指出，並沒有可資參考的統計數字來說明他們所佔之田額與其他地主的土地互相比較的比例。尤要者，還有另一個重要事實，必須加以考慮的；即是：滿人所擁有一部分土地是荒瘠不毛之地，不能供耕種的，所以不應與肥沃的土地等量齊觀。

從這些明顯而確鑿的事實看來，可見華崗關於全中國土地集中至極高程度之結論，並未有確鑿的統計數字來證實。因此，他隨後所謂太平革命是這種經濟情況的直接結果之臆測，便毫不足取了。

### 己、太平天國革命是階級鬥爭嗎？

太平天國革命究竟是不是階級鬥爭？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覆也是否定的。主要地是因爲，在三千年的中國史中，一向沒有所謂「階級」之存在的（意指馬克思學派所慣用的具有社會和經濟的意義者）。誠然，我們慣常所稱士（包括學者和官紳在內）、農、工、商等四民，由來已久。遠在周末的「穀梁傳」中已有謂「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祇在次序上與三代以後稍異而已。但這四民是職業上的區分，並不是像馬克思學派所認爲在經濟與社會上的「階級」。這四民生活在一起，融洽無間，既沒有階級意識，或階級界限，也沒有「階級仇恨」或「階級衝突」，更沒有「階級鬥爭」。在他們之間，沒有像西洋互相分隔的封建公侯（地主）和農奴、資本家和勞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等兩相仇視敵對的階級之存在。不特此也，這四民並不是不相往來互相隔絕的。一家的人各各可以任意選擇不同的職業，而且每一個人可能同時代表一個以上的職業，或者隨時自由更改其職業，職業之流動性絕對不受任何限制。舉例來說，一個官吏本是屬於「士民」，但在解組還鄉之後，可以改行業農，耕種祖先所傳下來的，或自己新購的田地。商人也可以轉成士紳。再者，中國的家庭制度，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制度，不同職業的族人，聚居在一個村子裏，斷不能形成「階級」。簡而言之，中國社會的制度和經濟的結構是萬不能容許馬克思式的「階級」之存在的。是故勉強施用馬克思的假定說於中國社會是完全無法立足的，除非這種「階級」是人爲（偽造）的，好像中共最近在大陸上所作所爲的一樣。

當馬克思學派的史家們詮釋太平革命的性質時，他們務須稱之爲「階級鬥爭」，不顧一切相反的證據，預先假定中國社會中有「階級」存在，爲的是證明馬克思主義是確實無訛的。不過，在這個左派作家的團體中，我竟發現了兩個人坦白地——當然是於無意中——寫下他們所確實看見的和相信的真象，而與正統的馬克思派理

論背道而馳的。其一是榮孟源，他說：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任務是推翻滿清政府的封建統治。……當時，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註廿三）

如果沒有「階級」，如何會有「階級鬥爭」呢？即使有「階級鬥爭」，究竟是什麼「階級」在互相鬥爭呢？既然承認太平革命運動畢竟是一種種族的和政治的革命，就必須揚棄馬克思學派之詮釋其爲「階級鬥爭」的史觀了。

另一人是萬斯年，他說：

「太平天國革命，是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相互錯綜的革命，又是民族關係掩蓋了階級關係的革命。所以在表面上便成爲漢民族反抗滿清統治的革命。」（註廿四）

萬氏雖在無意之間披露了歷史的真象，但還沒有想到，如果「階級鬥爭」係太平革命的根本性質，在史實與文獻上，尤其在如今所得見的豐富史料中，還有甚麼東西可以「掩蓋」之耶？然則所謂階級關係已被「掩蓋」云者，無異是承認絕不見有一些階級鬥爭的痕迹在其表裏；換言之，即是坦白否認太平革命是階級鬥爭而清楚認識其爲民族與政治的革命了。（譯者按：以上一段錄用著者簡氏原文，見「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一「導言」頁肆捌）

### 庚、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嗎？

然他們對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或經濟史觀仍然依依不捨，漠視一切一目了然的事實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誠如是則謂他們在現代學術界中表現了最可惡的教條主義（或武斷主義）和形式主義，絕不爲過。由這種史觀附系而生的結果就是，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或「農民戰爭」。這塊被蠻橫地釘在那個偉大革命運動之上的招牌，實有模糊含混的涵義，在一方面可能指投效革命的人全部或大部分是農民。但在他方面也可能指該運動的思想和目標。依後一意義，則謂太平軍領袖們所懷抱的和所領導的革命，是土地改革和爲農民的社會地位而戰。據我研究所得，這兩種意義都不真確。

當然，太平軍中的兵員，大多數是出身於隴畝之上的農民。但是，中國自古以來，以農立國，絕大多數人民都是以務農爲生，所

以歷代的兵丁，不論是屬那一方面，都是從農村中徵募而來的。以太平天國一役當時的情形而言，不論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一邊，都沒有例外。這種情形尤其可見於會國藩所新建的「湘軍」。曾氏嚴格規定招兵標準，凡勇丁要來自田間的樸實農民，市井居民不得應徵（註廿五）。就雙方兵員的原來職業而論，這顯然是農民打農民的一場戰爭（註廿六）（像中國古今所有的內戰一樣）。如果太平天國可被稱為「農民革命」，則投效太平軍者全體無一而非人類也，亦將可以稱為「人類革命」矣乎？

根據第二種涵義，如謂「農民革命」意指該運動係為土地改革和農民的社會地位而戰，由太平領袖們為農民爭取利益或由農民們起為自身利益而戰，那麼，所有的證據都是不利於這種武斷的史觀。第一、在太平軍最高領袖八人中，除一人以外，其餘全非農民出身。天王洪秀全一向以教館為業，原出身於一個小地主之家，自皈依基督教後，家中田地又多添了幾畝（註廿七）。原為太平天國智囊的南王馮雲山也是以教書為業的知識分子，「家道殷實」，大概是個相當富裕的地主（註廿八）。范文瀾在上引書頁一二二謂馮為「貧苦塾師」非也。正軍師東王楊秀清原在紫荊山燒炭的，家貧，但為山區一帶強有力的地方領袖（即土豪也），其對太平革命的參加與合作，厥功至偉，為不可少的人物。洪秀全的妹夫西王蕭朝貴是最初八大領袖中唯一出身於貧農之家者（註卅），但他也和楊秀清一樣，是紫荊山中的強有力的民衆領袖。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及其後封的豫王胡以晄，皆是特富的大地主，在醞釀革命運動時期，傾家附義，貢獻極大。三人中，胡以晄，武生出身，在廣西桂平和平南兩縣擁有田地之多不可計數，而韋昌輝一家則又是兼營營業的（註卅一），這門行業在廣西被認為是相當富有的。燕王秦日綱原是被革鄉勇，流為貴縣礦工。

自以上擎天八柱以次，太平軍高級幹部中有各種行業的代表，有當舖東主和資本家（如吳可憶、周勝坤、余廷璋），有教員和士人（如盧賢達、何震川、黃啓芳、曾劍揚、曾水源等），有退職軍官（如李開芳），有江湖游俠（如林鳳祥），有醫師（如洪秀全妻舅賴漢英，和李俊昌等），有木匠（如賓福壽），有廣州洋行買辦

（如吳如孝）有艇匪渠魁（如羅大綱），有女匪首（如蘇三娘）等等。這些人在太平天國的軍政方面，地位都很高。除上述八王及文武幹部以外，紫荊山的富豪曾氏全族都熱烈擁護或參加革命運動（如曾玉珍先聘馮雲山擔任家塾教書，後來又是洪秀全的居停主人，子姪輩熱心襄助大業）。

有許多相反的證據清清楚楚擺在眼前：如果我們再認為這些領袖們之發動或參加革命，是爲了個人獲得土地抑或是爲農民謀土地改革，而竟肯冒誅九族之險（這是滿清刑法中犯叛逆之罪最重的刑罰）那真是荒唐可笑。事實上，他們起義的動機是爲精神和正義的理想和目標所鼓舞的，這比馬克思學派之所謂經濟原因崇高得多、偉大得多了。他們原先的宗旨和後來的成就，的確確與「階級鬥爭」絕無關係。

若謂，投效太平軍的大多數農民，其目的是要求土地改革，企圖獲得多些的田地，這個假設也是毫無根據的。最初組成太平革命核心力量的「拜上帝會」的教徒，受洪、馮、楊等人所宣揚的基督教影響至深至鉅，馴至深信洪爲上帝特命降世的「真主」，要來領導他們誅滅一切的「妖」——滿人，官吏以及所有異教諸神和偶像的通稱——從事正義的戰爭。他們遵奉洪秀全的命令，棄家投軍，犧牲俗世的財物，男女老幼，闔家附義，將所有的金錢和貴重物品獻給共同的「聖庫」。他們同心同德結合一體，成爲真正的革命戰士，以建立信奉上帝的新朝爲唯一的積極的目標。也許其中有人以生命作賭注，別具私心，爲爭奪個人的利益和榮譽而參加，然縱是如此，也不能稱這革命運動爲有經濟性質的。昔曾國藩會上清帝一疏，很不知羞恥地謂「湘中勇夫，以投營爲名利兩全之場」（註卅三），我們讀此，斷不能說曾氏和湘勇所打的是經濟戰吧？

忠王李秀成在他的供狀中曾說，起事之初，農民有因飢餓和貧困而投身行伍者；後來，長江流域的貧民，爲生活計，蜂湧投效太平軍而並無任何宗教及政治志向的。這些話原可置信。然而同時他們並未懷有爲土地改革而戰的大志。此外，我們尚須注意另一大批人民（包括農民和普通市民），他們從太平軍所攻克或佔領的地方被徵召入伍。不論其是否出於自願，結果都被迫上陣作戰。我們不

能假定這些人懷着任何理想。他們只是遵奉太平軍嚴格的教規和軍法以圖暫時保存生命而已。

若謂頭腦簡單的農民，祇爲着一種土地改革的理論或願望，即便膽敢冒險殺身或誅九族的大險而犯最嚴重的叛逆之罪；非然者則徒爲增加幾畝田地而戰，僅憑常識就可判斷這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國歷史上還找不到這種情形的證據來。即使是飢民的暴動——因不堪政府的壓迫，鋌而走險，淪爲叛匪或強盜——也不會有預定的計劃，從事根本改革社會制度的革命。事實上，凡人爲家庭多增加幾畝田地的宗旨，乃爲安居樂業、穩定生活計，兼爲子孫後代長久享受計。因此，從心理上而言，徒而爲爭田去冒這麼大的危險，是自相矛盾、兩不相容的。

因爲馬克思學派緊緊抓住「太平革命是階級鬥爭」這個假定說，但未能定實究有何「階級」在鬥爭中，也未能從史料中找出任何證據來證實「階級」之存在，所以，一方面牽強附會強把太平軍派充農民無產階級，另一方面則指派會國藩和其他反革命者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因此，他們在歷史上又製造出另一個「階級鬥爭」，而施用自己的一套方法證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正確的。然而，歷史的事實擺在眼前，會國藩出身於寒素之家（曾氏自承），其先代曾辛勤務農，垂三百年。他們可能擁有薄田數畝；但絕不是大地主。他並不代表那些地主們，與所謂土地改革者們作戰。在曾氏的著作——詩、文、論著、奏摺、日記、家書和公告中，他從來沒有暗示他有與農民「階級」作經濟戰的觀念，這就是最好的證明。相反地，曾氏在湘軍出師時所頒佈的「討粵匪檄」，譴責太平軍罪行纍纍，其一便是「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因此，他本着愛民保民的大吏身分，弔民伐罪爲農民作戰，期恢復他們耕自己的田和納自己的稅之經濟權利（註卅四）。若指他是和農民作戰，真是絕大的譏諷！（注意：上錄會國藩所指責太平軍之言是錯誤的；也許他對於太平天國的均田新政策誤解了，但即使這種新政策也祇見諸文字，並未實際施行。）

唯一的太平文獻之足以供給馬克思學派的假定說一些真實的「軍火」者，乃是太平天國官書「天朝田畝制度」。這是新政權下的

農村組織和行政大綱。大體上，這是根據基督教信仰加上古社會理想而制定的政治計劃或政策。其中祇有一部分頒佈新的田地制度：全國所有的地將作公平分配，男女平等受田（兒童在十六歲以下者獲配額的半數）。須知，這個新制度下的基本原則並不是社會主義或經濟學說的原理，或任何近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是直接源出於基督教信仰，以上帝爲天父，其下凡男人女人皆兄弟姊妹，同屬於一個大家庭，所以每個人應獲得平等的配額。這新田制係將宗教原則實施於經濟方面的政制，然語其性質仍係他們的政治計劃之一，其宗旨在使全國平民得分享多些權利。在本性上它與歷代的田政相等，絕不能視爲太平革命的基本原則和目的。既是政治計劃，雖其帶有經濟性質，這新田制隨時可以改變或廢棄，要看實際局勢之要求爲如何。所以，自太平諸領袖發現這新田地制度不適用於實用時，即便廢止，永不施行。自克南京後，這項新制度即被束之高閣視同具文，無論在各種文件中，或在任何文字上都不見再有隻字提及。實際上，他們須要採用清朝所實施的古老的田地行政法。我至少發現了五種太平天國諸王和官吏所頒發的公告，宣佈廢棄新田制而田政一切照舊施行。此外，我還發現許多可靠的原有公據（有些是我自己所蒐藏者），如官吏發給田主的田契、農民和地主的田契和稅單和納稅人的收據，上面都列明在新政權下田政實施之確實情況和程序；但從大要到細則，無一不是照舊。甚至連舊時衙門中的吏胥，都獲保留原職，管理錢糧，執行田政的。至於各式收據和其書法也與舊時的完全一樣。從這些事實看來，我想可以穩下結論：這一項新的田地制度正是他們種種政策之一端，有如科舉取士、鑄造錢幣、頒佈新曆等。凡此都視實際情況的需要而隨時修改，所以不能引爲證據，以解釋太平革命是因經濟原因而發生的「農民革命」（註卅五）。

### 辛、重要的反證

在上文所引之「天朝田畝制度」一書中，有兩大證據益足以反證馬克思之以太平天國爲「農民革命」的史觀是錯誤的。第一、在該書中有一節載有太平天國懲罰一般犯罪溺職的官吏的法規。有幾段說明懲罰這種罪官的刑罰是「黜爲農」，如果太平革命在本質上

真是「農民革命」，那末，他們自然要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有如馬克思學派之所謂解放農民了。如果這是太平革命的主要目的，則農民自然會被提高至成爲貴族統治階級，而享受空前的聲威、榮譽和權利了。然而，在這新刑法之下，他們的社會地位實際上却貶低至「賤民」的地位，與被判充軍的罪囚一樣，因而他們的社會地位比在古時還要低。蓋在古代的四民中，他們的地位是第二等僅次於士民而已。

其次，該書又載有關於農民每季收成後糧食如何分配的法規。在這新規定之下，他們不能完全享受自己勞工的成果。祇能分配足夠家庭餬口的最低額而已。所有剩餘的糧食均須解繳公庫。的確，農民雖有其田，但不能保留所有生產的米糧。用馬克思學說的術語來說，政府實際上剝奪了他們的「剩餘價值」。事實上，他們降爲國家的農奴和統治階級的奴隸，而永無改善其生活條件的機會。

無疑地，這兩條法規給我們提供了證據，斷然否決了馬克思學派以太平天國革命爲「農民革命」的史觀。站在現代的立場來說，我以為這兩者乃是太平天國政制中的兩大缺點。貶低農民的社會地位反映了農民生活的艱苦和貧困，致令他們感到痛苦絕望萬劫不復。此外，由於捱盡困苦的经验，他們除了嫉視和憎恨這種生活，似乎還抱着悲觀的看法，相信農民的地位貧賤，是由全能的上帝早已注定的。命運安排，不可更易。他們投効太平軍，其所爭取的，無非是想脫離本身原來貧賤農民的社會地位，而提昇到其他高貴職位，藉保證他們獲得聲名（所謂「威風」）、榮譽、財富和安樂的生活。他們日夕所夢想的最高貴和最優裕的生活，乃是做文官武將或士人（事實上，太平軍人物對一切讀書人均極尊敬，盡其可能賦予他們尊貴職位和特別權利）。至於農民呢？他們只有令其仍留居於原來的貧賤地位而已。所以，他們把違法濫職的官吏降爲「賤民」的刑法是合理的。

至於第二種法規，我可爲之作合情合理的申辯。因爲，雖然在黑暗的一面是配給農民以最低額糧食以供應全家需要，而剝奪其所有剩餘的食糧，不過還有較光明的其他一面。依此法，艱苦的農民得有積極的保證，使他們再無飢餓之恐懼，因每個家庭將領到最低

額的糧食配給。我相信這就是本法規的原義和宗旨——雖然在當時看不出農民超過最低額的餘糧將被剝奪的惡果。既然，太平革命的目的和性質並非爲着土地改革，又不是要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則這個保民愛民若赤子之新政權，本着基督教普愛同胞的原則，使個個農民獲得自有田地，而且進而保證，在新政權之下，「人人飽暖」（原文），由此令全國人民得有比前更善的生活。這政策雖未實行，但有此理想，無可否認地，已是百尺竿頭長足的進步，比之滿清已勝一籌了。（註卅五）

總而言之，討論過以上這兩則反證之後，更有誰可以固執那荒誕虛假的理論，妄以太平天國革命是以摧毀地主階級而建立一個由農民爲主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鬥爭」「農民革命」呢？

### 王、關於宗教方面

我們確知，太平天國最重要的特徵是基督教。基督教信仰不僅是他們革命大志和理想之元始的原因和終極的目的，而且也是整個運動自始至終的推動力量和支持力量。浸淫於唯物哲學的馬克思學派，本來是一切宗教的死敵；但是他們不能漠視或否認基督教在那偉大的革命中的重要性。於是，當他們詮釋太平天國歷史之時，不得不沖淡基督教在太平天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強爲減縮至最低程度，如前文所引錄左派史家的說法，不是稱它爲僅是革命運動的「外衣」，便是稱它爲虛僞信仰，被狡詐地利用來「欺騙」他們所要吸收的頭腦簡單的農民。范文瀾和華崗等等史家都堅持此說。（凡歷代有革命崛起而帶有宗教迷信成分的，中國的史家都持上言的理論以作合理化的解釋，咸以爲利用宗教作爲愚民或煽動的工具，這是吾國文人傳統的看法）。以太平天國的基督教而言，許多非共的，甚或顯著的反共的史家（有如錢穆氏），亦具有同樣的觀點，不過當然與馬克思學派的動機大異（註三十六）。簡而言之，馬克思學派必須要埋沒或沖淡太平天國的彰明顯著的宗教特性，而縮減至最低程度；否則，他們唯物史觀的哲學便與明顯的史實格格不相入了。不過，有一位名呂振羽的左派史家獨紓己見，坦白地承認說：

「太平天國是以改革了的基督教——移植在中國土壤上的『拜上帝會』教義爲其思想武器的。其政治觀念、理論、綱領

等等，都包括在這教義中。」（註三十七）

這一說近乎實情，因為他承認基督教為太平天國一切政治思想的主要源頭。換言之，他幾乎承認，那是一種屬於宗教性質的革命，但是仍然不能夠捨棄馬克思的教條。因此，在馬克思學派中，又出現了另一個自相矛盾的理論。

即使那傑出的共黨史家如范文瀾者，也持有這樣矛盾的觀點。他毫無保留地宣稱，所有太平革命的平等理想，——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民族的和國際的平等——都是源出於基督教信仰的。如果我們讀到他親自所寫的下面一段話時，一定會感到驚訝：

「『救世』、『醒世』、『覺世』三篇（皆洪氏起義前所自撰的）的製成（註三十八）奠定了太平天國的理論基礎。『洪秀全的上帝是平等、自由、博愛的上帝，是戰鬥誅妖的上帝，總之是一個革命的上帝。』

「（同上）三篇是上帝教根本教義，要求在上帝統率下，國與國平等，人與人平等，男與女平等，貧與富平等，反對私，反對妖，反對不正，反對壓迫，充滿着對閻羅妖戰鬥的勇氣。此後太平天國的教義，都從三篇教義（註三十八）出發，成為太平天國的教義，成為太平革命運動的最高原則。」（註三十九）

像范氏這樣的一個馬克思學派鉅子——在共產陣營中，被尊為中國史學權威——如果他認識太平革命的最高原則是以基督教教義為根據（甚至經濟平等的觀念——指田地平均分配——也是源出於此），那麼，我們還有什麼批評的話可說的呢？我們祇是指出他同時站在馬克思學派的矛盾立場而已。

### 癸、關於太平革命失敗的原因

在馬克思學派所提出關於太平革命失敗的幾種理論中，其中有一種特別荒謬可笑，應予以駁斥。如在前文所引用者，他們一再提到史達林的理論：太平革命之失敗，因為缺乏勞工階級的領導。有些人甚至妄謂，太平革命之失敗，是因沒有無產階級政黨，以領導農民所致。然而，這種說法是不難駁倒的——當我們憶起在中國史中，至少對於這一假定說有三個重大的例外：即是：由三朝開國之

君，西漢劉邦、東漢劉秀和明朝朱元璋等，所領導的革命。他們每個人所領導的軍隊主要兵員是由農民所組成的，並無勞工階級或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而每個人都得獲永垂青史的成功，而個別推翻了統治的王朝。事實上，我們業已指出，從有史可稽之時代直到太平天國之時代，中國從來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之存在。因此，這種說法在歷史學上勢難成立的。尤甚者，即使勞工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領導對於促進革命之成功是絕對必要的，但因當時並無那些「階級」，則史學家如何能指並無存在的東西為失敗的原因呢？這種史觀之不合邏輯和荒謬怪誕，正如硬指太平革命之失敗是因他們沒有飛機和原子彈一樣吧？他們如此的史觀，不是以學人治學的真誠態度來詮釋歷史，卻是利用太平史觀以為宣傳作用，其目的端在證明共產黨在現代共產革命中的重要性——一切都與他們的通常戰術（統戰）互相配合的。

### 肆 結 論

從上文對於馬克思學派的史觀的批評觀之，相信我們可以下一個穩健而可靠的結論：除非一切邏輯和所有的確實證據都被歪曲了，這整個辯論的題目表出一個至為有趣的例證——強使馬克思學派史觀普遍施用到中國歷史上，特別施用到太平天國史上是絕無可能的。不特此也，假定馬克思學派的史觀是正確的學說，但施用在太平天國歷史上，至少是一個例外，而這一個大例外包括居住於全球地面上面積的八分之一之六分之一的人民，歷時五千年。在全人類史中，這個重大例外，其力量之大，足以使自詡為可以隨時隨地施用於全人類的普遍和永恆原則的馬克思史觀完全作廢。由此推斷，我們可以解釋，為什麼蘇俄和中共的馬克思信徒執意要以「階級鬥爭」或「農民革命」或「反封建運動」等名辭來詮釋太平天國革命了。因為，如若不然，馬克斯主義將會有全部崩倒之虞了。

末了，在我們研究「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真正內在性質是什麼？」問題時，對於馬克思學派史觀的駁斥祇是消極的一面。其在積極方面，照著者個人四十餘年研究工作之結果，根據充足的證實的



史料和確鑿有據的文獻，所得的結論乃是：太平天國是宗教的、民族的和政治的三合一的革命運動，而一切社會的、道德的、文化的、經濟的，以及政治的設施與改革均是納入於政治範疇之內的。（註四十）

### 註釋

（一）請看一九五一年五月份第十卷第三卷英文「遠東季刊」施友忠著「中國非共作家之太平天國史觀」，略述下列古今各史家學者對太平天國史的意見，如曾國藩、陳恭祿、錢穆、孫中山先生、蔣總統、簡又文、朱希祖、彭澤益、陳訓慈、蕭公權、周谷城、蕭一山、郭廷以、羅爾綱。他以為這幾位都是非共陣營的作家，但周谷城雖不是真正共產黨員，却是屬於馬克思學派的左傾作家。至羅爾綱現仍留居大陸，在共產淫威下，已完全改變從前的觀念，在近著中表現與馬克思學派相同的太平天國史觀。

（二）因手頭沒有馬克思作品的原文，著者祇得根據以下兩本書：（甲）「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中文譯本，一九五七年北平版。（乙）朱謙之教授所蒐集馬克思有關太平天國的論斷之中文譯本，載「現代史學」一九四二年元月第一卷第一期，又載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香港「大公報」。

再詳細說明：「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一書中，有三篇馬克思論太平天國的文章：

（甲）「中國和歐洲的革命」，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

（乙）「中國事件」，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在「維也納新聞」發表。

（丙）「列強侵略與中國革命」，大概是摘錄馬克思各時期的論說彙編為此篇。

（三）查實馬克思在論太平天國的文句中雖有暗示「農民革命」之意，但未嘗使用「農民」這個名詞。此處所引用者是從朱謙之教授在「大公報」所載轉錄。大概所有共產黨作家均認為馬克思的原意如此。「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一書內之譯文，「農民」這個名詞並未見用。

（四）根據朱謙之在「現代史學」所載。在中文譯本中，拉狄克是姓氏，其名未見提及。

（五）張霄鳴著「太平天國革命史」。第一三七頁。  
李一塵著「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第三頁。

（六）李羣傑著「太平天國的政治思想」，原序。

（七）「現代史學」。

（八）若干年後，我聞說達林已去了美國長久居留。他是否改變他的馬克思學派史觀，無從得知。

（九）鄧嗣禹著：英文「太平天國革命史的新光」，第十七—十八頁。一九五〇年哈佛大學版。

（十）「中國現代史文集」，載英文「亞洲研究月刊」，十七卷第一期，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號。第六十八頁。

（十一）本節係節錄梅谷原文，同上六十八—六十九頁。

（十二）以下所列係其中主要書目：  
「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八冊，神州國光社。  
「太平天國革命文物圖錄」共三編，上海出版公司，羣聯出版

社。  
「太平天國起義調查報告」，三聯書店。  
「太平天國革命論文集」，三聯書店。

（十三）見羅爾綱著「太平天國文物圖釋」，一九五六年版，三聯書店。  
「太平天國起義調查報告」

（十四）華崗著「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海燕書店，以上引言係由一九五〇年第三版錄出。

（十五）范文瀾著。  
（甲）「中國近代史」第三章「太平天國革命」，一九五〇年修正版。

（乙）「金田起義一百週年紀念」，載「太平天國革命論文集」

序。  
（十六）簡又文著「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導言，十四—十六頁，商務印書館版。

(十七)根據「大公報」朱謙之彙編。  
(十八)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第一六一頁、原文朱謙之在「大公報」解釋。

(十九)錄自「亞洲研究月刊」第五十七——五十八頁。

(二十)見「辭海」之「封建」條。

(廿一)王瑛著「太平天國前夕的土地問題」，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三卷一期。

(廿二)沈鍊之著「太平天國革命前夕的土地問題」，載南京「中央日報」之「地政週刊」第七十七期。

(廿三)榮孟源著「中國近百年史略」第四十二頁，一九五四年版。

(廿四)萬斯年「在中國新史學會座談會紀錄」發言，載一九三六年第二卷第一期「新建設」。

(廿五)「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二「招兵」。

(廿六)見「曾文正公雜著」，卷二「營規」。

(廿七)見韓山文著「太平天國起義記」，原文於一八五四年在香港出版。另見簡又文中譯本。

(廿八)「天情道理書」第十六頁。

(廿九)「天情道理書」第十四頁。

(三十)「天情道理書」第十五頁。據多數史書所載，蕭朝貴和楊秀清一樣不是農民，而同是燒炭為生的。獨本書謂其「自耕而食」。此係太平官書，當然比較可靠。

(卅一)著者於一九四二年在廣西十三縣調查採訪所得資料。

(卅二)見「賊情彙纂」。

(卅三)見曾氏「咸豐七年謝恩摺」。

(卅四)曾氏「討粵匪檄」，載「求闕齋弟子記」。

(卅五)請看一九五四年元月香港大學出版之「東方文化」第一卷第一期所載拙著「太平天國田政考」，或「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上册「田政考」修正全文。

(卅六)錢穆著「國史大綱」，六一三——六一八頁。

(卅七)呂振羽著「史學研究論文集」，二二七頁，一九五四年版。

(卅八)「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載蕭一山輯「太平天國叢書」。

(卅九)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一〇六——一〇九頁、一四〇——一四一頁。

(四十)請參考拙著「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一九五八年版)，及「太平天國全史」(一九六二年版)兩書，所載有關著者對於本題之意見及論據之詳細史實及論據。

### 本刊上期目錄

中印邊界與匪印衝突.....	吳俊才
從地理觀點看亞洲歷史的發展.....	沙學浚
第二屆亞洲史學會議的經過和觀感.....	張貴永
聯合國與太空法的發展.....	丘宏達
當前大陸情勢與共匪動向.....	懷遠
美國封鎖古巴後.....	亦農
葉門政變的剖視與展望.....	湯德衡
寮國中立局勢的發展.....	黎世芬
柏林界牆一年來之局勢分析.....	宋鳳恩
俄南關係新發展.....	尹慶耀
俄共宣傳工作之組訓及重要幹部.....	關素質
共產集團經濟協作的方向.....	呂律
蘇俄能否趕上並超過美國.....	顧富章譯
動態述評(國際·俄帝·共匪)	

# 美國的期中選舉與今後的政治動向

鄧公玄

## 壹 前言

今年的美國期中選舉，亦即八十八屆國會選舉，對美國今後兩年的政治動向具有重大關係。因為在上屆（八十七屆）國會中，民主黨雖擁有絕對多數，但甘迺迪的立法要求，尤其關於內政方面的許多改革方案，並未能完全順利通過。因此，甘迺迪總統便不但要維持民主黨的絕對多數，而且要設法增加其嫡系人士的席次。至於共和黨方面，他們認為甘迺迪總統的威望已逐漸下降，故於藉此機會，力求在國會中增加相當的席次，以爲下屆總統選舉奠定東山再起的基礎。所以這次期中選舉的意義，便不言而喻了。

但是我們要明瞭此次選舉與未來政治動向的意義，首先便應明瞭過去兩年間甘氏與國會的相互關係。因此我們在未分析本屆選舉結果以前，不能不把甘迺迪總統在過去兩年的立法計劃與八十七屆國會的反應，以及本屆選舉前夕的各種情形，先行予以探究。

## 貳 甘迺迪總統與八十七屆國會

### (一) 美國八十七屆國會的兩黨陣容

美國八十七屆國會不論參院或衆院，民主黨皆擁絕對多數，其分配情形如次：

衆院方面  
民主黨 二六三席（南方民主黨九九席）

美國的期中選舉與今後的政治動向

共和黨 一七四席（缺額一席）  
參院方面

民主黨 六四席（南方民主黨由一八席至二二席，蓋須視問題性質而定）

共和黨 三六席

由是可知民主黨議員如能依照政黨分野而投票，則任何法案皆可順利通過，共和黨之反對毫不足懼。但事實上則大謬不然，民主黨的南方議員向屬保守派，如遇其同黨總統之立法而帶有激進性者，亦多一致反對。至於共和黨議員更多數傾向保守，其中進步份子雖亦不乏人，但爲數甚少。由於南方民主黨議員與共和黨議員在立場上反而較接近，故凡遇有激進性的法案，彼等每與共和黨互相接近，往往使其擱置或否決之。至於共和黨的自由派或進步份子則常有傾向於支持民主黨總統法案之事實。此種情形之存在，使甘迺迪總統對於立法計劃不能有可靠之計票方法。

依照現在兩院兩黨席次之分配，如國會依照嚴格的政黨分野而表決，甘迺迪在衆院方面，亦必須有南方民主黨九十九票的四十五票之支持，而在參院方面，則至少須有南方民主黨五票至六票之贊同，方能達到目的。

然而南方各州議員幾乎完全係由民主黨一黨所包辦，且久之可自動因年資而出任各重要委員會之主席。因此，他們對於白宮主人爲誰初無重大關係，於是往往各行其是，不欲受同黨總統之支配。因爲南方民主黨議員常久於其職，倘該黨在國會而係多數黨則彼等遂控制立法的重要關鍵，使其他民主黨議員不能不受其左右。此一特殊情形之存在，又爲吾人對美國實際政治不能不特別加以注意者

據統計所得，南方民主黨議員對民主黨總統的立法計劃，其支持的百分率為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五不等，現在甘迺迪政府下，其百分率已降為百分之四十五。至於共和黨議員之支持甘迺迪者，原亦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之數，但自鋼鐵加價案發生以後，此種支持幾乎已完全喪失。所以甘迺迪的立法計劃遂遭受更大的困難。

### (二) 甘迺迪的立法要求與國會的反映

甘迺迪在競選時曾以「新境界」相號召，所謂「新境界」者，蓋分對內與對外兩面而言。在對外方面，其目標仍與美國傳統外交政策相去無幾，甘氏所謂建立和平的法治世界，實言之，即是由和平競賽的方式，使蘇俄被迫而放棄其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同時並促使國際共產主義逐漸改變其形態，而卒接受和平共存的國際制度。但是要求此種對外目標之實現，必須在對內方面先行致力於本身實力之強大，尤其在經濟發展與科學進步上面加強努力，無論在核子武器方面、太空競賽方面均能超越蘇俄，使其永遠不能趕上，始能有濟。所以在甘氏看來，對內政方面的進步，實為對外爭取與角逐的基礎。

因此，甘迺迪自就任以後即開始着手於如何使美國能夠向前邁進，尤其在經濟建設與科學發展方面，甘氏主張應由聯邦政府制定許多有關法案，以期充分發生飛躍突進的效果。但是甘氏所要求的此種立法，幾乎無一不需要國庫大量開支，增加國民租稅負擔，同時又幾乎無一而不與個人之自由權利發生牽連。我們知道美國經濟向來建立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之上，今甘氏於制定新法加以干涉，自為一般保守份子所反對。而凡是制定干涉性的法條，即不啻等於總統行政權之擴大，故亦往往引起議員們的忌刻，而不願輕易作無條件的授權行為。

職是之故，當甘迺迪於去年就職後之不久，國會雖與白宮間有極短暫的蜜月之期，但自去年四月間古巴問題失敗以後，甘氏的威望即受重大損害，其立法要求亦常遭阻撓。在去年一年間，甘氏在國會方面受到重大失敗的約有下列法案：

- ① 老年醫藥照料法案；
  - ② 設立城市事務部案；
  - ③ 補助公立學校建築經費案；
  - ④ 設立專科以上學校獎學金名額案；
  - ⑤ 資助醫藥學校擴充計劃案。
- 以上各案原是甘氏認為重要而不可少的要求，可是皆遭遇阻礙悉予擱置了。

今年國會復會以後，甘氏的威望又逐漸增高，在本年初，據蓋浦普的測驗表示，甘氏的人望曾達到百分之七十九的高度，故在國會方面也處於有利的地位，於是甘氏懲前毖後，乃加強其對國會的壓力，以便得以順利通過若干重要法案。可是到了四月間，由於甘氏干涉鋼鐵公司加價案之故，尤其五月杪紐約股票發生三十年來所未有的風潮以後，甘氏的威望，遂又一落千丈，而其在國會中的地位也同樣遭受重大損害。因此，八十七屆國會在數月之間，幾乎一事不做，被稱為「Do nothing Congress」。

可是今年為「期中選舉」(Mid-term Election Year)之年，各議員亦深知如不在本會期內在立法方面有相當的表現，則在今秋改選時將遭遇不利的裁判。尤其民主黨議員更深知其中的利害，故卒不能不設法彌補其缺陷。照美國選舉的歷史慣例而論，凡是期中選舉，在朝黨往往是中立的，假使民主黨議員在此一會期中毫無所成就，那麼，其影響將更大。所以民主黨議員不能不於八九月以後開始加緊審議各種法案，同時又在甘氏的壓力下，不能不勉強通過若干重要新法案。

### (三) 本屆國會所通過的重要法案與擱置的立法計劃

甘迺迪就任以來，曾向國會提出許多重要法案的要求，其中大多數皆為對內問題的立法，其與國防外交有關者，為數較少，且大多皆為國會所通過。茲將兩年來已由國會制定成爲法律者，以及甘氏所要求而未爲國會所接納者，分別列舉於後：

甲、已通過成為法律者：

- ① 提高最低工資案；
- ② 加強公司與工會對於雇用人員撫卹基金之規程以防弊端案；
- ③ 關於實施失業人員再訓練的四億三千五百萬之計劃案；
- ④ 增高社會安全福利基金案；
- ⑤ 失業者童年兒女之救濟案；
- ⑥ 「拉丁美洲進步聯盟」計劃案；
- ⑦ 增加航空機場補助案；
- ⑧ 關於刑事與賭博新法律之制定案；
- ⑨ 增加小本營業之協助案；
- ⑩ 衰落區域之救助案；
- ⑪ 設置和平工作團並擴大其經費與組織案；
- ⑫ 加緊太空計劃案；
- ⑬ 設置裁軍專門機構案；
- ⑭ 提高國債最高限額，由二、九八〇億增至三、〇八〇億美元案。
- ⑮ 建築房屋及清除貧民區之計劃案；
- ⑯ 補助教育電視案；
- ⑰ 增設七十三個聯邦推事案；
- ⑱ 擴大對河流污濁之控制計劃；
- ⑲ 增加公路使用人之稅率案；
- ⑳ 削減旅行稅率案；
- ㉑ 增加美國對國際貨幣基金資本案；
- ㉒ 修改若干租稅法規案；
- ㉓ 授權總統得依互惠協定削減關稅稅率並得提高關稅或規定進口之限額案；
- ㉔ 聯邦對於藥品之試驗、製造與銷售等得加強管制案；
- ㉕ 通過公共工程建築費約五十億美元（其中包括衰落區域緊急工程計劃九億美元在內）；
- ㉖ 增加一百六十萬聯邦公務人員之薪給及其退休之福利計劃；
- ㉗ 通過自由職業人員得設置免費之退休基金案；
- ㉘ 對穀物管制法延長一年並決定於一九六四年開始實施關於小麥之

美國的期中選舉與今後的政治動向

管制案（甘氏原提農業管理法案未獲全部通過）；

- ㉙ 增加郵費及印花費價格案；
  - ㉚ 設立私營太空交通公司案；
  - ㉛ 核准美政府購買聯合國公債一億美元案；
  - ㉜ 擴大國家公園計劃（包括加州及德州的海濱公園在內）案；
  - ㉝ 授權總統得召集十五萬後備兵員案；
  - ㉞ 授權總統得對古巴採取任何必要行動案；
  - ㉟ 通過一九六三年度援外法案——甘氏原要求四十七億美元嗣經兩院協商最後決定為三十九億八千八百九十萬美元；
  - ㊱ 通過一九六三年國防經費五百二十六億美元案。
- 乙、國會否決或擱置之立法計劃：
- ① 依社會安全制度實施老年人之駐院醫療及看護利益案；
  - ② 授權總統得隨時削減稅率案；
  - ③ 設置一個新城市事務部案；
  - ④ 停止紅利及利息之課稅案；
  - ⑤ 對公立學校與專科學校給予補助案；
  - ⑥ 設置專科以上學校聯邦獎學金名額案；
  - ⑦ 建立四億六千元之公眾防空設備之計劃案；
  - ⑧ 停止黑人投票時之「文字測驗辦法」案；
  - ⑨ 新「公平雇用」法規之制定案；
  - ⑩ 擴大聯邦貿易委員會對商業例規之管轄權案；
  - ⑪ 擴充眾院名額由四三五人至四三八人案；
  - ⑫ 授權總統對飼料生產實施強制管理權案；
  - ⑬ 制定「消費者保護制度」之新法規案；
  - ⑭ 規定公司合併應先呈報政府案；
  - ⑮ 實施普遍防疫注射案；
  - ⑯ 提高對外援助之權力案；
  - ⑰ 設立常設民權委員會機構案；
  - ⑱ 加強對藥品、糧食及化粧品之管制案；
  - ⑲ 加強總統對聯邦準備局主管人員之管制案；
  - ⑳ 設立成年文盲學校案；

- ② 增強海洋研究計劃與工作案；
- ③ 加強反托拉斯法之效力案；
- ④ 對海外收入制定新稅率案。

### (四) 八十七屆國會的立法特質

我們把本屆國會通過的法案情形，以及其所否決或擱置的法案性質加以分析，即知國會對於內政方面頗與總統觀念互有出入，但就對外與國防方面的立法而言，則雙方因無顯著歧見之存在，甚至國會對反共之態度，有時尤較甘迺迪總統更為堅定而果敢。

(一) 在國防建設與太空計劃方面，凡總統所要求之經費均如數通過，甚至有時且予以增加。

(二) 援外法案雖較甘氏原要求者略減，但大體上仍照現行計劃辦理，不致有重大影響。

(三) 國會參眾兩院一致授權總統得召集十五萬人之後備兵員，以應緊急事變。

(四) 國會參眾兩院一致授權總統得採取任何行動以對付古巴之危機。

(五) 一九六三年度美國聯邦總支出共計九百二十億美元之鉅，實為平時最高的紀錄。就中大多數開支皆為有關國防與太空計劃者，足徵國會對此一方面之支出並非慳吝。

## 參 本屆選舉的經過情形

### (一) 選舉的範圍與兩黨競選準備

照美國憲法的規定，總統任期四年，但國會眾議院議員任期二年，每兩年全部改選，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故凡遇非總統改選時之選舉，皆稱之為期中選舉。在期中選舉時，除國會兩院議員選舉外，各州州長亦有同時改選者。

今年十一月六日，為美國八十八屆國會選舉之期，其應改選者

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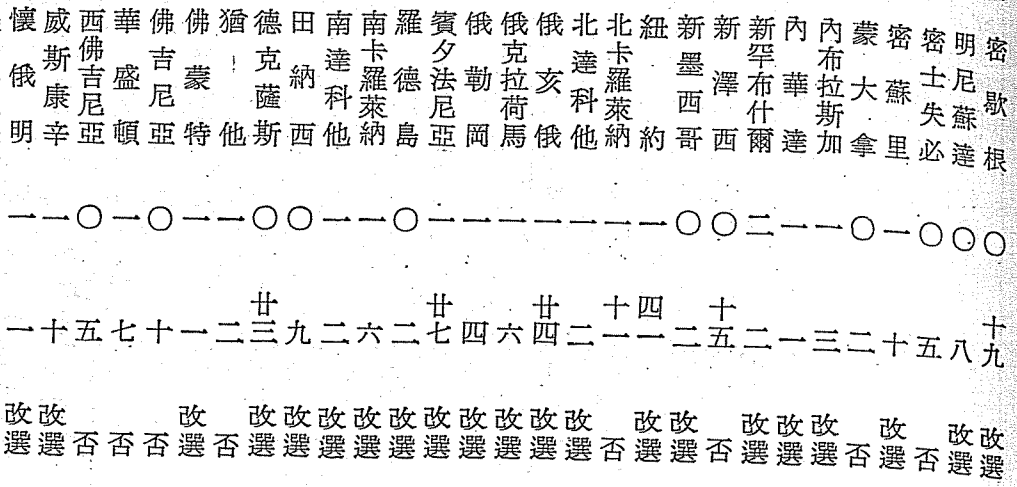
- 一、參議員 三十九席（共為一〇〇席，每年改選三分之一）
  - 二、眾議員 四三五席（原為四三七席，因重定選區減少二席）
  - 三、州長 三十五人（其餘各州不改選）
- 上項選舉在各州的詳情如次：

### 美國各州選舉概覽

州名	參議員	眾議員	州長
亞拉巴馬	一	八	改選
阿拉斯加	一	一	改選
亞利桑那	一	三	改選
阿肯色	一	四	改選
加利福尼亞	一	卅八	改選
科羅拉多	一	四	改選
康涅狄格	一	六	改選
特拉華	〇	一	否
佛羅里達	一	十二	改選
佐治亞	一	十二	改選
夏威夷	一	二	改選
愛達棉	二	二	改選
伊利諾	一	廿四	否
印地安納	一	十一	否
衣阿華	一	七	改選
肯薩斯	二	五	改選
肯塔基	一	七	否
路易斯安那	一	八	否
緬因	〇	二	改選
馬里蘭	一	八	改選
馬薩諸塞	一	十二	改選

兩年的立法趨勢，即對下屆總統選舉亦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期中選

美國的期中選舉與今後的政治動向



舉雖不如大選年的熱鬧緊張，然兩黨仍以全力爭取之。依照過去的統計，在以往六十年間，凡在朝黨每須損失國會議席，自一九〇四年來，十五次期中選舉無不皆然，其間祇有一九〇二及一九三四年始為例外。在本屆選舉之前夕，甘迺迪總統曾說：「歷史與我們對對」，其意蓋即指此。

美國為共和黨與民主黨交互起伏的兩大政黨，然自週年以來，由於羅斯福的長期執政，以及選民的傾向，民主黨大有獨霸政壇之勢。由一九四六年以來，共和黨在國會的席次，僅一九四六年的八十屆，及一九五二年的八十三屆國會略佔多數，其餘歷屆皆為民主黨所控制。

美國會兩黨席次近年來分配情形

選舉年次	總統	民主黨	共和黨	民主黨	共和黨
一九四六	杜魯門	四四	五一	一八八	二四六
一九四八	杜魯門	五四	四二	二六三	一七一
一九五〇	杜魯門	四九	四七	二三四	一九九
一九五二	艾森豪	四七	四八	二一三	二二一
一九五四	艾森豪	四九	四七	二二二	二〇四
一九五六	艾森豪	四九	四七	二三四	二〇一
一九五八	艾森豪	六四	三四	二八三	一五三
一九六〇	甘迺迪	六四	三六	二六三	一七四

然而美國的政黨與英國政黨殊不相同，在英國，其國會議員的投票必須依黨的路線而進行，否則，勢須脫黨。美國則不如英國的嚴格，在道義上兩黨議員固應支持其同黨總統的政策，但事實上則往往有極大的自由。例如八十七屆國會民主黨雖佔絕對多數，然甘迺迪的立法要求，則頗遭其同黨議員之阻撓，而無法完全順利通過。

當本屆選舉的前夕，共和黨人士以為可以在國會尤其在眾院方面增加十席至二十席，以期挽回其頹勢。而甘迺迪則決心要維持其國會的多數，尤其希望能支持其主張的同黨候選獲得更多的席次，以便今後得以貫徹其立法計劃。因此，兩黨人士對本屆選舉，皆以

全力爭取其勝利。

(一) 本屆選舉的結果與特徵

這次選舉的結果，據統計所得如次：

美國第八十八屆國會選舉情形

(一) 參議院 (共一〇〇席)					
	本屆選出者	無須改選者	在下屆席次	上屆席次	增或減
民主黨	二三人	四三人	六八席	六四席	增四席
共和黨	一四人	一八人	三二席	三六席	減四席
(欲控制參院須有五十一席)					
(二) 眾議院 (本屆議員共四三五席，上屆有四三七席)					
	本屆選出者	上屆席次	增	或	減
民主黨	二五八席	二六三席			減四席
共和黨	一七六席	一七四席			增二席
(欲控制眾院須有二一八席)					
(三) 各州州長 (本屆改選者三十五州)					
	本屆選出者	無須改選者			
民主黨	二二人	一三人			
共和黨	一四人	二人			

我們把上述選舉結果加以分析，可以獲得下列各項值得注意的特徵。

(一) 民主黨在國會兩院仍控制絕對多數——在參院方面，民主黨增加四席，在眾院方面，民主黨較上屆少四席，而共和黨則僅增二席，在表決上殊無影響之可言。

(二) 在州長選舉方面，共和黨略居有利形勢——此次兩黨所得州長的數目，並相差無幾，但共和黨取得賓夕佛尼亞、俄亥俄、密歇根等工業區大州，對未來總統選舉人票的數目上佔極大便宜，故不能不謂為一種勝利。

(三) 個人因素重於政黨關係——此次選舉的勝利，多賴個人聲望與競選能力之關係，例如共和黨的洛克斐勒之於紐約，隆尼之於密歇根、斯克蘭頓之於賓夕佛尼亞，其當選或連任皆由其個人因素而決定，並非因政黨關係而來。

(四) 新境界派人士的抬頭——甘迺迪總統的幼弟愛德華甘迺迪之當選為麻州參議員，顯係甘迺迪總統人望的影響所使然，此無疑的係新境界派的抬頭表徵。次如在明尼蘇達州，甘迺迪支持的佛拉塞(三十八歲)與曾任二十年眾議員之共和黨周以德角逐，竟擊敗周以德而當選。又如威斯康辛的選舉，新境界派的尼遜遜亦擊敗曾任參議員二十四年的共和黨惠利，而取代其地位。即此數例已足證新境界派人士確有日趨抬頭之勢。

(五) 黑人政治地位漸見提高——在眾院方面，黑人原有議員四人，此次除原有四人皆得連任外，並有由加州產生的黑人議員一名，共為五人，實創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此五名黑人議員皆為民主黨，亦為一項有趣之事實，蓋黑人原由共和黨林肯所解放，而今則皆投向於民主黨，民主黨勢力之膨脹顯非偶然。

(六) 新人物並不甚多——在本屆議員中，求如甘迺迪幼弟之一躍而為參議員者固不易見，即在眾院方面四三五席中，其新人物亦僅有六十七席，其餘皆為舊人。

(七) 兩黨藩籬有相互侵入的趨勢——共和黨的柏爾蒙取得五十五年來民主黨州長的地位，而成為奧克拉荷馬的首次共和黨州長，在打破了堅固南方的壁壘，而在南方十一州中，原僅有共和黨議員



七席，此次除此七席均得連任外，又復增加了四席，共為十一席。至於民主黨亦取得佛爾蒙州及新澤普夏兩州的州長，此亦為數十年來所未有之現象。可見兩黨有互相入侵對方藩籬的新現象。

(八)極左極右兩派皆告失敗——在極右派方面有 John Birch Society，該社原在衆院有議員兩席，此次均告失敗，而新參加競選的該社兩名候選人亦名落孫山。至在極左派方面，則美國民主行動委員會 (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 的人士亦無一人當選。美國選民對極左極右兩派皆不願支持，由此可以獲得明證。

(九)共和黨老成派頗遭不利的結果——共和黨人之參加此次競選者，其老成派頗多不利，而尤以尼克森與周以德之落選最引人注意。此外，則共和黨老參議員惠利，與卡皮哈納 (印第安納州) 之落選，當然亦為共和黨之損失。

### (三)封鎖古巴為民主黨勝利的主要原

因

本屆選舉，論者謂此係二十八年來期中選舉最佳成績的表現。在過去五十年間，每當期中選舉時，凡在朝黨平均皆損失衆院議席三十九席之多。但此次民主黨在參院增加四席，在衆院僅損失四席，而共和黨所得者僅增加衆院二席，不能不謂為民主黨的重大勝利。

據白宮人士的分析，此次選舉已為甘迺迪總統打開了立法的順利門徑，尤其在衆院方面加強了他的力量。據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貝利說：「這是甘迺迪的重大勝利。」而甘氏本人於聞悉選舉的初步結果時，亦由其白宮秘書沙林吉宣讀其聲明說：

「昨日的選舉使我深受鼓勵，我國與國會今後兩年將面臨重大的責任，而我確信：國會將以一種進步和充滿活力的態度去迎接此項責任。」

在選舉以前，共和黨因鑒於甘迺迪在國會方面遭遇障礙，以為其聲望已形低落，故認為今年的選舉大有可為。尤其自八、九月間

美國的期中選舉與今後的政治動向

蘇俄對古巴採取積極的侵略措施以後，美國輿論更為譁然。因此，共和黨遂利用古巴問題作為競選的資本，使民主黨人士大有無法招架之勢。同時共和黨更敦促艾森豪親自出馬為該黨作助選活動，對甘迺迪的政策不斷予以無情的抨擊，以期達到一次極大的勝利。

至於甘迺迪總統與民主黨方面，亦深知本屆選舉形勢殊為不利，尤其甘氏本人甚為憂慮，因為下屆國會的組成份子如何，不僅對今後兩年立法的成敗有直接關係，且與下屆總統選舉亦將有密切的影響。所以他不但希望民主黨仍擁有兩院的多數，而且希望新境界派人士有席次的增加。但是由於古巴問題日形嚴重，共和黨方執此以作攻擊的口號，不但使甘氏深感棘手，即輿論界亦頗為民主黨選舉就憂。

甘氏知道古巴問題是本屆選舉的中心問題，如果對此一問題不能不有所作為，則其他一切爭論皆是多餘的。所以當他於獲得蘇俄在古巴建立火箭基地的確實情報以後，便決心採取斷然的行動，卒於十月二十二日晚間，突然宣佈軍事封鎖古巴，要求蘇俄立刻撤除一切攻擊性的武器。自從他宣佈了封鎖古巴的政策以後，他便坐鎮白宮，不再作選舉的活動，這在一面固然是要隨時應付可能發生的事變；而在另一方面，則深知有此一着之後，也不用多費口舌了。而尤其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也是最有助於甘氏與民主黨勝利的，就是赫魯曉夫居然立刻屈服，使甘氏兵不血刃而獲得一次空前的冷戰勝利。

由於甘氏在選舉前不及一個月的期間在外交上有如此輝煌的勝利，當然使甘氏對外對內的威望皆作直線的上升。也因為如此，遂使共和黨選舉的一項最有利的武器被解除了。有些共和黨人士對於甘氏允許赫魯的要求，蘇俄撤退火箭及一切攻擊性武器，則美國亦即同意不進攻古巴，認為此種承認仍為軟弱之表現，反而引起美國選民的反感。因此若干執此意見的人士竟遭落選的結果。所以然者，因為美國選民雖支持對古巴採取強硬政策，但並不贊成必須冒戰爭的危險。他們認為甘迺迪能够採取強硬政策同時又能適可而止，乃是最高明的，也因此，使甘迺迪格外把握了選舉勝利的關鍵。所以這次選舉就是以古巴問題為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 肆 今後兩年間美國政治動向的推測

我們把這次選舉的情形詳加研究之後，認為美國今後兩年間的政治動向似有下述的趨勢：

(一)美國將更傾向於溫和的自由主義——這次選舉，兩黨所爭論的問題，在內政方面，民主黨主張前進與改革，共和黨則力持穩健與保守；在外交方面，民主黨主張慎重與堅定，共和黨則力持強硬與冒險。換言之，在對內方面，民主黨較共和黨為激進，在對外方面，共和黨較民主黨為激進。但自甘氏宣佈封鎖古巴後，共和黨的號召工具不但失效，且其主張冒險進攻古巴的看法，反而不為選民所同情。至於內政方面，選民似乎贊同溫和的自由主義，不論極左與極右的份子皆為其所摒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今後兩年間，美國的對內與對外政策，似將繼續向溫和的自由主義發展。

(二)甘迺迪總統的立法計劃較過去容易實現——由於新境界派人士在國會席位的增加，今後兩年間當然比較可以順利通過甘氏所要求的各項立法計劃，尤其有關內政改革的方案。但國會各委員會的主席仍將由舊人蟬聯，他們對於法案實具有上下其手的特權，倘甘氏不能與各委員會主席改善關係，則仍無以圓滿達到其目的。所以下屆國會雖於甘氏有利，但亦尚不能保證其完全沒有阻礙。然而甘氏的威望既已增加，則其影響國會的力量亦將較過去為大。因此，甘迺迪總統的立法要求雖未必能夠暢行無阻，但無論如何，必較八十七屆國會順利得多。

(三)此次選舉對一九六四年大選的影響尚難逆料——許多人均對此次選舉與下屆總統選舉的影響發生推測的興趣。民主黨人士認為甘氏經過這次的勝利以後，他連任總統的基礎業已鞏固了。在一九六〇年的選舉，可說甘氏只是險勝，事實上他不過是「少數總統」；現在他的聲望既已大大的提高，當然不復為「少數總統」了。只要他在今後兩年間能夠維持今天的水準，他的連任殊無疑問。但是共和黨人士則認為不然，他們這次在州長選舉方面，不但保持紐約，而且取得了賓夕佛尼亞、密歇根及俄亥俄等工業區的州長地位

，這些州的總統選舉人票數甚多，實有利未來的總統選舉。即白宮人士對於上述數州的失敗也引為重大損失，則共和黨人士的說法，也非完全無因。共和黨紐約州州長洛克斐勒且對人表示，他在一九六〇年就可以擊敗甘迺迪，一九六四年當然更能擊敗甘迺迪。不過，照我們看來，目前來推測這事畢竟還是言之過早。

(四)美國對外政策將更趨積極但殆不致走向戰爭——經過此次古巴事件的考驗，美國的對外政策，今後將更趨於積極，那是無庸置疑的。美國的冷戰戰略，過去顯然是過於穩重，這當然是由於畏懼戰爭的結果。通過古巴事件之後，蘇俄之畏懼戰爭，已證明其尤甚於美國，由此一事實的證明，當然可以減少美國害怕戰爭的心理。但是大多美國人仍以爲赫魯曉夫此次之屈服，乃係由於地理的條件而決定，故不能援引到其他地區，故仍未必在其他地區向蘇俄挑戰。但是無論如何，美國對整個冷戰問題勢必重作全盤的考慮，只要在不觸發核子戰爭的範圍以內，必能較以前更強硬。

(五)美國今後的對華政策——甘迺迪的對華政策，最初頗受左傾的自由主義者的影響，故寄望於與共匪改善關係。但自就職以後，尤其自今年七月間臺海風雲發生以後，其態度已轉趨積極，不但不復存任何幻想，而且已認識共匪有垮台的可能（由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哈里曼屢次發表的言論來看，便知其中的道理）。今甘氏，既在古巴問題上獲致全勝，我們相信甘氏雖未必贊成我國反攻大陸，但對我國反攻大陸的同情心必然增加不少。共匪正在進攻印度，美國已明白表示支持尼赫魯，因此，共匪反美的憤怒，日趨高漲，匪美間的關係，必然更形惡化。假使匪印戰爭只是小規模的長期拉鋸戰，美國當然不會介入；假定一旦形成爲大規模的鬥爭，則美國爲避免使印度淪於魔掌的慘劇，勢不能不採取適當的行動。美國如不願直接捲入漩渦，即當設法予以側面的打擊，而我國的反攻大陸正是最適合此一要求的有效方法。如果有這種客觀情形存在時，美國對我國的反攻計劃須應該作同情的考慮了。

x  
x  
x  
x  
x  
x

# 匪黨內爭之三大問題

懷遠

其一是匪黨高階層的政策紛爭與權力傾軋；其二是匪黨中央與地方反中央勢力的鬥爭；其三是新黨員反共及離心力的增長。

匪黨於竊佔大陸十三年間，曾舉行十餘次大整風。據共匪解釋，整風是「一種適合於黨內鬥爭的運動形式」，毛曾當權後，一向用整風來排除阻力、整肅異己、打擊反對派。故整風頻仍，反映匪黨內爭的劇烈。

十三年來的匪黨內爭，集中表現於三方面，其一是匪黨高階層的政策紛爭與權力傾軋，若干次整風即爲此而發生，或與此有密切關連。

共匪自組黨至江西叛亂期間，派系林立，黨爭極其激烈，其領導中心由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陳紹禹，因內鬩而數度更易。民國二十四年，匪黨在流竄途中召開「遵義會議」，毛曾打垮陳紹禹派而告抬頭，其後十年間，又鬥倒各反對派，形成毛派一枝獨秀。三十四年匪黨第七次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以毛曾思想爲匪黨指導思想，正式確立毛曾的獨裁地位。但各反對派領袖除張國燾出走外，大多仍任匪黨要職，具有潛勢力，並圖謀再起。因之，偽政權成立後，毛派與舊有反毛派間的衝突會一度死灰復燃。主要有：(一)三十九年再打擊陳紹禹派，陳匪被排出匪黨政治局，繼失去偽政權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傳陳匪現已離開大陸，卜居莫斯科。(二)四十年清算謀藉工會系統重振旗鼓的李立三派，李匪相繼喪失偽總工會主席及偽政權勞動部長的職務，向毛曾悔過後被貶任爲匪黨工業部副部長，繼調任匪黨華北局書記，已淪爲第三流角色。

新的派系亦次第出現，並遭整肅。其一是四十一年清除青年團

匪黨內爭之三大問題

的反黨勢力，主持團務將近二十年的馮文彬被罷黜，初降任匪黨天津市委工業部長，繼被放逐至內蒙牧區，受「勞動改造」，迄今生死不明。其二是四十三、四年的反「高(崗)饒(漱石)聯盟」，權勢不下劉少奇、周恩來二會的高匪被迫自殺，饒匪(匪黨中央組織部長)被囚禁，至今未聞開釋，東北等地有九名高級匪幹受牽連。共匪公佈高、饒的罪狀是：高匪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之代表人居，反對「白區的黨」，要求出任匪黨總書記或副主席或僞國務院總理，即取代劉、周二匪的地位。饒匪則與高崗結成聯盟，助高從事「分裂活動」。但究其實際，這場鬥爭不僅是高崗與劉、周爭奪毛曾以下領導權力的衝突，蓋因：(一)偽政權成立後，知識份子匪幹(即「白區的黨」)高踞要津，工農匪幹(即「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則遭冷落，故匪黨內流傳着「工農打天下，文人坐天下」的怨聲，高崗是代表工農匪幹說話，或利用這批人「不平之鳴」，作爲爭權奪利的工具。(二)共匪後來承認在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間，匪黨首腦部對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有緩進與急進之爭，而高匪正担任草擬這個計劃的僞「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四十八年反右傾期間，共匪指摘高崗的右傾思想仍在東北各級匪幹中滋長，東北匪黨內反急進的右傾份子，即是高崗的「代理人」。足見高匪是屬於主張緩進的一派。工農匪幹自知政治前途黯淡，多思維持現狀，安享土改中獲得的鬥爭果實。高匪一派的主張，確能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故所謂「高饒聯盟」，在匪黨內實有相當數量的支持者，共匪曾發動整風，加以清除。

在此前後，一個較「高饒聯盟」強大的反對勢力，已在潛滋暗長，並逐漸形成新的派系，即緩進派。嗣後匪黨高階層的內爭，即

是緩進派與當權激進派的衝突。現有資料顯示，到目前為止，這兩派已經過五度激戰。

(一)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兩派對農業合作化與經濟建設的速度問題，發生激烈爭執。緩進派主張十五年合作化，並由偽國務院制定計劃，令各地施行，對發展過速的地區，則責成其解散。激進派則以匪黨中央與毛酋出面，於四十二及四十四兩度變更偽國務院頒發之緩進計劃，令各地恢復已解散的合作社，並提出三年合作化計劃，與緩進派抗衡。四十四年底，毛匪又親自出馬排斥經濟建設的緩進主張，提示「多快好省的躍進方針」。繼於四十五年掀起合作化及經濟建設的高潮。緩進派因而失利。

(二)四十五年，經濟躍進遭挫折，加速合作化的結果則釀成社會動亂，由而觸發「冒進」與「反冒進」的爭論，緩進派得佔上風。是年匪黨第八次大會決定的對內政策，即大致符合緩進派的主張。四十六年，經建與合作化同趨緩和。同一時期，兩派因「鳴放」問題又引起政治策略的寬猛之爭，贊成「鳴放」的緩進派亦獲得勝利。

(三)四十六年「鳴放」失敗，次年匪黨「八大」兩次會議，兩派會有激烈爭吵，緩進派在會上受到批判，激進派重居優勢。此次會議決定在政治方面採用極端高壓政策，經濟方面由緩進改為大躍進，繼又推行「人民公社」，對內政策急劇轉向左傾。但緩進派並未屈服，並揚言待機反撲。

(四)四十八年，躍進造成經濟失調，「公社」化後農村騷亂有增無已，緩進派乘機反攻，兩派鬥爭再起高潮。緩進派的進攻箭頭直指毛、劉諸匪酋，責其制定的「三面紅旗」為「左傾冒險主義」，犯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這是毛酋當權以來所遭受最猛烈的攻擊。緩進派力主廢除三大暴政，恢復匪黨第八次大會的穩健路線，另反對「以黨領政」，主張實行黨政分權，這更在搖撼毛酋與激進派的權勢。激進派雖在政策上作若干退讓，但為維護毛酋威望及其獨裁權力，故發動「反右傾運動」，向攻擊毛劉最烈的反對派要員開刀，乃有整肅「彭黃反黨集團」事件。已知被整者有彭德懷（匪黨政治局委員、偽國防部長）、張聞天（匪黨政治局候補委員、偽外交部副部長）、黃克誠（匪黨書記處書記、匪軍總參謀長）

、蕭克（匪黨中委、偽國防部副部長）、洪學智（匪黨候補中委、匪軍總後勤部部長）、周小舟（匪黨候補中委、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等匪要。

由於緩進派已在若干省市自行其是的推行其緩進政策，並至少在十餘省市激起反冒進的右傾風潮，故反右傾運動又波連到地方各級黨政機構，形成全面大整肅。這一整風運動直至四十九年上半年始告結束。

(五)四十九年以來，共匪為了挽救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經濟政策之爭而言，緩進派已贏得一次勝利。然而，兩派之爭非僅未因而緩和，反有更趨兇厲的徵象。今年六月舉行的匪黨「十中全會」，即是一次鬥爭的會議。而「十中全會」公報使用祇有在黨爭面臨一個回合的決戰或最後攤牌時期才使用的敵對性詞彙，描述當前內爭的情勢，像強調壓制黨內的顛覆活動，加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甚至指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足證兩派傾軋已惡化至以仇敵相視、無法調和的地步。而在這內鬩白熱化的緊要關頭，緩進派的一個主角，久已失勢的陳雲，已經有九個多月沒有公開露面，盛傳其已遭整肅。

綜上所述，這兩派的政見祇有策略的分歧，並無原則上性的差別，其分歧僅涉及對內政策，而未牽連對外政策，共匪黨右派之鼓吹作基本路線與制度上的大變革，迥異其趣。一些跡象雖顯示匪黨首腦部可能有個別右派或同情右派的人，但不能將之與緩進派等量齊觀。何以策略之爭會鬥到誓不兩立的局面？答案是在策略之爭的背後，存在着激烈的權力衝突。四十八年後政策向右轉，而反右傾的鬥爭反變本加厲，說明權力傾軋已凌駕策略爭端之上，成為兩派爭奪之主要課題。

目前還沒有充分證據，對兩派人事作精確判斷，但由上述情況看來，激進派掌握黨權，緩進派控制政權，這兩派衝突即是黨權派與政權派的衝突，並且是勢均力敵，長期對峙，難決勝負。再參證其他資料，可以估算出兩派的主要人物大致是：(一)激進派——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譚震林、陸定一、李富春、康生、陳伯達諸

匪；而毛曾在反右派以後，也做了激進派的主腦。(二)緩進派——周恩來、陳雲、陳毅、彭德懷、張聞天、鄧子恢、李維漢諸匪。而緩進派之能以有力量與激進派長期抗衡，可能得到匪黨政治局游離及失意份子如朱德、劉伯承等匪的支持，還可能得到莫斯科支持。這一場激烈的權力爭奪戰，尙在演變之中。

## 二

匪黨內爭的第二個問題，是匪黨中央與地方反中央勢力的鬥爭。地方反中央勢力包含三方面：(一)各省市自發的反中央勢力，包括右派及右傾集團；(二)由緩進派製造及運用的地方反中共勢力；(三)由地方派系鬥爭中形成的反中央勢力。這一鬥爭已延續將近十年，並經過幾次大搏鬥。

(一)四十三、四年的反「地方割據」。四十三年二月，匪黨四中全會指責某些高級匪幹「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從事宗派與分裂活動，並決定施以「無情的鬥爭」，但對已悔悟者仍給予改過機會。這雖然是針對「高饒聯盟」而發，但非專指高饒。在高崗被整肅以前，共匪重要施政，都是先在東北試辦，然後推廣到其他地區，故謂高崗在東北割據稱雄，反抗中央，實未盡可信。匪黨四中全會公報暗示問題包括匪黨中央、省市黨委以上的高級負責匪幹，及匪軍的高級幹部，這裏面就不只有高饒。四、五月間匪「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的四篇社論，則承認進行宗派活動，向黨鬧獨立時，在匪黨內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在此期間，匪黨六大區中央局及各省市匪黨組織，都相繼舉行會議，着重檢查本身的錯誤，並加糾正。四十三年六月，共匪撤銷六大行政區，繼以對地方人事作大規模的調整。這也是爲了消弭割據的。其他佔山爲王的可能不若高崗至死不肯低頭，而早已俯首認罪，故得苟全，沒有釀成如高饒事件的大風波。

(二)四十六、七年的反右派與地方主義。據不完全統計，在大陸二十八個省市中，遼寧、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廣東、廣西、福建、山東、吉林、雲南、青海、甘肅、內蒙等十四省的領導階層，發現有「反黨集團」，被整肅的高級匪幹七十餘人，有三個偽

省長、八個副省長、十四個廳局長等正副主管、一個匪黨省委第一書記、二十多個書記及正副部長。在上述各省及其他省市不屬於任何集團，而以右派罪名被整肅的省市及匪要，約在一百人以上。這些集團有的是「右派集團」，有的是「反黨宗派集團」或「地方主義集團」，但多數是二者兼具，其共同的戰鬥目標是反對匪黨中央。地方右派集團及右派份子，一部份是改良派，另一部份則倡導大變革。遼寧以偽省長杜者衡爲首的「右派集團」，要廢除無產階級專政及社會主義制度；匪黨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夏生領導的右派集團，主張取消合作化，恢復小農經營。少數民族地區的右派都是激進派，又都是地方民族主義者。他們反對共匪的民族區域自治，主張單一的民族自治或聯邦制，甚至要求獨立，反對「社會主義改造」，主張以民族化代替共產主義化，有的並另組民族黨或單獨的共產黨。而無論是改良派或革命派，都集中目標攻擊合作化、經濟政策、「肅反」政策及「黨內整風」，甚至包庇、煽動並與黨外的「反革命」和右派聯合起來，進攻匪黨。共匪形容這些反黨集團大都是「有綱領、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向黨進攻」，其活動「猖狂到極點」。廣東古大存、馮白駒（均偽副省長）的反黨集團，就曾在海南島策動羣衆武裝暴動。

地方主義集團的反黨活動，甚至比右派集團還更兇猛。上述海南暴動就是廣東土共派的傑作。這些多屬工農出身的土共，在叛亂時期曾出死入生，如今反屈居外來幹部之下，並飽嘗譏嘲與排擠，乃結成勢力，與外來幹部抗衡。土共憤恨遭匪黨冷遇，與之爭權的外來幹部，又係由匪黨上層派遣，並予支持，而匪黨暴政造成的災禍，亦易爲熟悉地方情況的土共所體認。因之，土共派常會轉變成為「反黨集團」，使地方派系之爭，演化爲地方與中央的衝突。而若干地方的「反黨集團」，如浙江偽省長沙文漢領導的集團，還獲得匪黨中央緩進派的奧援。

(三)四十八、九年的反右傾運動。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初，在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蘇、江西、安徽、河南、河北、山東、甘肅、青海、遼寧、新疆、上海等十六個省市，皆爆發熾烈的反冒進風潮，東北地區還有高崗餘黨散播

反共言論，進行反黨活動。其中一部份是匪幹與民衆的自發行動，其餘則是有組織的行動。這種有組織的行動遍及某些省份或數省之間，顯然係各該省匪首所爲，其廣及數省之間者，原動力可能來自北平。這類行動雖不若自發行動的激烈，但舉其行動較爲普遍者而言，如解散公共食堂、鼓動農民退出「公社」；廢棄集體制度，實行「包產到戶」；大量削減工業生產指標；關閉學校開辦的工廠、農場，改行正常教育；限制或取消以羣衆運動的方式推行政令等，都屬否定共匪的「三面紅旗」，有些且已超越緩進派的主張。

四十九年初，共匪承認有湖南、河南、山東、青海等省份，左傾思想對其制定及執行該年躍進計劃，已形成阻礙。同時聲稱，在湖南、武漢等地已擊敗「右傾集團」的進攻，但詳細情形，始終未見宣佈。

(四)四十九年以來的反「分散主義」傾向。四十九年秋至五十年春天，匪黨中央及地方機關報刊，大舉圍剿地方組織中抗拒匪黨政策的「特殊化」傾向與「自以爲是」的歪風，去年七月至今年五月間，針對同一現象的捷伐之聲又甚囂塵上。舉幾個最近的例子。共匪指責各級領導人「鬧獨立性和各自爲政」，「在自己的崗位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喜歡黨的領導和監督，不遵重上級決定和指示，違背黨的政策和紀律，危害黨的團結和統一。」(一九六二、一、三匪「人民日報」：「論全局觀點」)

匪「人民日報」的另一篇專論又批評「那種認爲黨的政策合乎自己口味的就執行，不合乎口味的就不執行，各取所需，七折八扣，以個人感想代替黨的政策的行爲」，及「把自己工作的地區當作小天地的思想和行爲」。(一九六二、四、三匪「人民日報」：「加強集中領導，發揚黨內民主」)

今年二月出版的匪「紅旗」(三、四期合刊)社論，呼籲黨徒要「絕對服從領導，反對任何降低黨的作用和削弱黨的統一的分散主義傾向，更不允許向黨鬧獨立性，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同時要「堅決執行黨的政策，不許借口特殊情況，爲了個人利益在執行時打折扣」。社論並透露共匪正在「開展及不良傾向的鬥爭」。而在此以前，匪「人民日報」已經表示：「對於任何違反黨的章程、

黨的紀律、違反共黨主義道德和國家法律、法令的黨員，都必須按照黨的原則嚴肅處理，絕不姑息遷就。」而對於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蛻化變質份子、堅不悔改並從事「危害黨的活動份子」，則要「進行堅決的鬥爭，直到開除他們出黨」。(一九六二、十一、十五匪「人民日報」：「黨的紀律」)

反分散主義的具體情況，共匪始終諱莫如深，外界僅能從如上所引比較空泛的報導中瞭解其梗概，但據此已可作如下的判斷：這場鬥爭是以往幾次匪黨中央與地方反中央勢力大搏鬥的延續，其規模及其嚴重程度，雖可能不若反右派之甚，但亦不亞於反地方割據與反右傾運動。

據不完全统计，共匪在此期間撤換七省的匪黨第一書記，其中甘肅的張仲良、寧夏的楊靜仁、山東的舒同、青海的高峯、廣西的劉建勛，去職後都出處不明。又在此期間，各省市新任命的匪黨書記等在五十人以上，合理的解釋是，省市匪黨重要人事又有相當大的調動，而這次調動，至少有一部份與反分散主義的鬥爭有關連。

地方匪黨組織這一連串分離運動的主要特徵有三：(一)地方反中央勢力都是右翼勢力，由派系紛爭演變而成的「反黨集團」，其歸趨亦是向右轉。這裏面包括溫和和改革到「再革命」的不同成份，究其成因，利害的考慮固其一端，更重要的還在這批人比較明瞭地方情況，深知匪黨決策的錯誤與杆格難行，勉強行之，徒增紛擾。他們指「肅反」爲「製造敵人」，因而反對「肅反」政策，即係明證。共匪並承認有些匪幹之所以拒不執行匪黨政策，是由於他們覺得匪黨政策與人民利益背道而馳，或恐激起民變，或爲同情人民疾苦，將政策束諸高閣，而自行其是。有這些想法的人，在來自上級與民間的沉重壓力之下，自然會逐漸覺察前非，走向反黨、反共了。(二)地方土共對外來幹部的衝突，實即高饒事件所暴露的工農幹部與知識份子的衝突，這是共匪一直無法解決的一大難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地方派系鬥爭及由而觸發的反中央傾向，即難以根絕。(三)若干地方分離與反分離的戰鬥，實由於匪黨高階層的兩派傾軋；換言之，兩派已由中央打到地方，地方組織已成爲兩派交鋒的一大戰場。故兩派之爭一日不平息，地方的烽煙亦難望熄滅。

匪黨內爭的第三個大問題，是新老黨員反共離心力量的增長，幾乎已到了依靠不間斷的整風，也很難保持穩固的程度。歷次整風運動的演變就是最有力的證據。本文限於篇幅，祇想就這一方面略加申論。

十三年來的匪黨內整肅，可以「反右派」為界限，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大整風共有五次。

(一)三十九年夏至四十年春的全黨整風，目標有二：○改善組織狀況，「洗刷投機份子出黨」，並對不合標準的黨員加以教育及改造；○整頓工作作風，主要是反對「命令主義」。這次整黨是結合土地改革進行的，其動機即在掃除土改的阻力。

(二)四十五年夏至四十二年年的「整頓基層組織」，分三期實施。主旨在清洗反對及破壞土改的匪幹，遏制土改後農村的資本主義傾向，糾除城鄉基層匪幹的腐化墮落與「退坡思想」。所謂「退坡思想」，指的是城鄉匪幹「翻了身」之後，滿足於類如「三十畝地一條牛，老婆娃娃照炕頭」的安定生活，不願意再做幹部、搞鬥爭和「革命」了。

(三)四十至四十一年年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正如如匪所述，這次整風實質是在整肅黨內的「資產階級的俘虜」，為「轉入社會主義掃清道路」。

(四)四十二年及四十三年年的新三反(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運動，其目的在完在「三反」的未了任務，並清除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阻力。緊接這次整風，又發動黨內「肅反」，清洗黨內的「反革命份子」。黨內「肅反」在四十四、五年毛會主導「反右傾保守主義」及加速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期間，更是雷厲風行。共匪宣佈在此期間，黨內「反革命份子」或單獨行動，或與黨外「反革命份子」合流，從事諸如怠工、縱火、暗殺、破壞生產及生產設備、聚眾鬧事、以至武裝暴動等抗暴活動，而以破壞合作化運動的事件最夥。若干地方並發現由匪幹倡組的反共政團，如重慶民兵幹部組織的「中華民主聯合黨」、上海青年團幹部組成的「中國青

匪黨內爭之三大問題

年救國協會」、本溪煉鐵廠幹部的「中國民政黨」、武漢在職在學青年合組的「中國人道民主聯盟」、福建永春匪幹的「勞動黨」等。(五)四十四年的清算「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抗戰前「左翼作家聯盟」時代匪黨文藝界宗派鬥爭的延伸及一次決戰，這次整肅在黨內由文藝界擴展至文化教育各界，再由黨內擴展至黨外，形成對知識份子的大屠殺，其用意亦在為「社會主義革命」排除障礙。「鳴放」時期，這次屠殺會遭受知識界的猛烈抨擊。

以上幾次整風，皆是共匪為執行某項政策，或為適應某一政策轉變而發動，旨在斬除荆棘，為推行暴政開闢通路。共匪遭遇的反抗異常強烈，但仍能排難前進，達成某些任務。阻力雖然大，亦僅能迫使共匪走些彎路，沒有打亂它赤化大陸的主要步驟。另一方面，整風揭露不少腐惡現象，對防制匪黨的腐爛，亦會起某些作用。

其後的整風，則展現出與此不同的情況。四十六年的全黨整風，原定目標是整治黨內左傾偏差，改善「黨羣關係」，但因「鳴放」燃發動亂，釀成政治危機，乃變質為對黨內黨外的反右派鬥爭。「鳴放」及嗣後出現的匪黨右派份子，普及大陸各省市，從城鄉基層組織直至匪偽中央若干部會的中高級幹部，所在皆是。為數最多的一在農村，一在文教界，據不完全的統計，後者包括五十家以上匪黨團機關報刊、出版社、新聞社與廣播電台的匪幹，四十所以上大中學校的教職員及學生，一些著名作家、科學家與文化團體的工作人員，很多是有二、三十年以上黨齡的老匪幹。黨內右派反對共匪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基本政策，與黨外右派相呼應，要求作大幅度的改革，或倡導「再革命」。此外，他們並猛烈抨責匪黨已為剝削階級和爭權奪利的宗派集團，攻擊毛會是「亡國之君」，所用的是「亡國之臣」，呼籲改造匪黨，或倡組第三黨、新共產黨。他們結成各種團體，鼓動羣眾控訴匪黨罪行，組織學生及工農鬧事，其言論與行動，都遠較前述各省組織中的右派集團激烈。

反右派鬥爭至四十七年方告結束。是年三月，匪黨召開「全國監察工作會議」，決定今後黨內監察工作的兩大重點，一是清除右派、「反革命份子」及「各種壞份子」；一是注重偵辦兩條路線鬥爭的

案件、破壞團結的案件、危害大躍進的案件。迄今匪黨的很多文件，依然把右派列為整肅對象，足見這一勢力，到現在還沒有消除。

反右派後共匪黨務政策很多改變，其一是整風經常化，並多視地方需要自行辦理，消息也很少披露。最顯著的是農村，四十七年後農村整黨每年都有一兩次，各地舉辦的時間和整風的內容，每有差異。但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繼續打擊右翼勢力，鞏固「公社」，惟所要鞏固的已不是前進中的「公社」，而是節節後退中的「公社」。

反右派後除經常小整風，還有幾次大整風，其一是四十八、九、十年間反右傾運動。這次全黨整風除反擊各省市反中央勢力外，其主要鋒銜仍然是指向知識界與農村。四十九年二至三月，各省市匪黨會議決定整頓農村基層組織，反對右傾情緒，並吐露農村中還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有些基層組織掌握在「敵對份子」手裏。同年八月，四川、廣東等地又有一次「五反」（反破壞生產、反盜竊國家財富、反私宰耕牛家畜、反毀壞公物、反浪費人力物力）運動。

四十九年間，共匪報刊不斷指責各級幹部及其黨徒腐化墮落，祇有「個人主義之志」，而非「革命之志」，很容易掉進「資本主義的泥坑」；指責他們「敵我不分」，「對黨離心離德」，「與反黨份子卿卿我我」；甚至「勾結敵人，進行破壞」；並指責「經過許多革命考驗」的老匪幹，對結束私有經濟的革命却停滯不前，「甚至反轉方向，攻擊黨和革命」。這一年內，山西、內蒙、東北等地又發現匪幹組成的反共政團。

五十一年一月，匪黨九中全會決定黨內整風，以洗刷「違法亂紀」及進行破壞活動的「壞份子」，並改造「思想覺悟不高」的幹部。同年九月共匪又發動黨員再教育運動，規定以是否理解及忠實執行政策，是否能做黨的馴服工具，是否認真過組織生活為甄審標準，對全體黨員作一次檢查。今年四月，再強調不論對新老黨員，都要重新教育。到了九月，匪黨「十中全會」又決定繼續推展反修正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

在此期間，共匪一再提出警告，要注意防範黨內的「反革命活動」，清除「黨的反革命份子、蛻化份子及其他壞份子」，並廣積針對其黨徒沒落的精神狀態與離心傾向，展開攻擊。

這一階段整風與前一階段不同之處在於，右派的進攻迫使共匪來一次政策「大躍進」，然後又因躍進的失敗與反對派的壓力，再一步步後退。共匪的步伐被打亂了，其政策左右搖擺，朝令暮改，並頻傳敗退，整風對此已喪失「清道夫」的作用。其次，整風與政策已不能相輔而行，整風反右傾，為向左開道路，政策反而向右轉，兩相背馳。整風已不為政策清掃前進的通路，單純成了殘害異己的手段。共匪決策的錯失與大局的逆轉，主要雖非一般黨員的敵對行為所促成，惟其長期在失敗與錯誤中打滾，勢必大大貶損匪黨的威信，益增其黨徒對黨的懷疑與反感，推動其走向反黨與反共。而整風雖然愈演愈烈，但黨員的反抗行為與離心傾向却未被遏止，即是匪黨對黨內控制力已大大削弱的有力佐證。

#### 四

綜上所述，共匪正面臨其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內潰危機。總括來說，這一危機表現為匪黨左翼與右翼勢力的長期衝突。但分而言之，構成危機的三方面又各有其特徵。就匪黨首腦部的兩派糾紛而言，其爭論在策略的分歧與權力的傾軋；就一般黨員與幹部的反共及離心傾向而言，其肇因不外於理想的幻滅、意識的覺醒、對暴政的憎恨、與個人利害的考慮；就地方反中央傾向而言，則同時具有以上的兩種特徵。這固足顯示匪黨內爭的深刻程度，實有難以消弭的背景，但亦顯示反對勢力的分歧龐雜，有其不易聚合的因素。同時應該看到，其離心力雖屬強大，然就於匪黨權要及一部份頑固不化的黨徒而言，由於共產教條的禁錮、既得利益的保持，與夫聲色權位的誘惑等因素，則使他們發生凝結力而與離心力相對抗。據此推斷其可能趨勢：（一）匪黨內爭將持續，危機至少在短期內難望解除。（二）若無莫斯科積極策應，爆發「宮廷革命」，推倒毛酋，由反對派登場的可能性不大，縱使實現，緩進派與激進派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世人對此不應保有幻想。（三）由地方組織或其他反共勢力掀動局部革命的可能性不可輕估，但是否能擴延成燎原之勢，主要取決於有無外力響應。而內爭非僅已削弱匪黨控制力，且必出現若干統治薄弱地區；內爭之延長亦必阻礙其救亡大計的推進，使其事倍功半，此皆為外力造成極有利的形勢。



# 共匪經濟「調整」政策之意義與問題

餘生

共匪自五十年年初起，開始在國民經濟方面放棄高速度成長之要求，進行經濟之「調整」。高速度成長原為四十七年提出「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所規定，「生產大躍進」為「總路線」之具體化，「人民公社」則為滿足實行「大躍進」所需物質及精神條件（集中財力、物力尤其人力與提高主觀能动性）之組織。「總路線」、「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形成三位一體，被稱為「三面紅旗」。進入「調整」時期以後，經濟成長速度立即放緩，經濟成長率亦隨而降低。同時，在經濟體制特別是農村「人民公社」方面亦出現一聯串與前一時期大不相同之面貌。

在改採經濟「調整」政策之前一年，共匪曾高揭「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優先發展重工業與迅速發展農業相結合」之指導原則，並稱此一原則將為一項根本與長遠之方針。迨「調整」政策提出以後，即集中全力支援農業生產，不再強調以工業為主導，更絕口不提優先發展重工業，但「三面紅旗」之陰影仍不時出現於各項文件之中。

共匪改採「調整」政策之背景為四十九年農業生產之悲慘下降。該年工業部份生產雖較上年微有增長亦未能完成計劃。農業生產大幅度下跌，加以人口繼續增殖，乃導致物資全面缺乏，糧食尤形不足，次年輕工業原料無力充分供應，商品出口大量減少，資金積累困難有增無已，農業減產影響已擴及國民經濟全體，工、商、財政各方均受到深重之打擊。此種情形使共匪瀕於救死不遑之境地。「調整」政策之正式提出，係在五十年一月共匪偽九中全會，該次全會公報指出：

一、農業部門 農業生產連續兩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本年必

共匪經濟「調整」政策之意義與問題

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之方針，加強各行各業對農業之支援，盡最大努力爭取農業生產獲得較好之收成。在農村中必須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貫徹執行關於「人民公社」和農村經濟之各項政策，切實安排好社員生活，幫助社員渡過由於自然災害所造成之困難，並且為全年農業增產做好準備。

二、輕工業部門 自然災害造成輕工業原料不足，應努力加以克服，並開闢新原料來源，增加生產，盡可能保證人民生活必需品之供應。

三、重工業部門 重工業三年來已有發展，主要產品產量已大超過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二年即五十、五十一兩年原定之水平，今年應適當縮小基本建設之規模，調整發展之速度，在已有勝利之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與「提高」之方針，即努力提高產品質量，提高產品品種，加強生產薄弱環節，節約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

四、其他方面 農業歉收使市場供應發生暫時困難，急待解決，各有關部門應迅速採取措施，幫助輕工業，城鄉手工業、家庭副業與郊區農業之發展，增加各種日用品與副食品之生產，同時改進商業工作，活躍農村初級市場，逐步改進供應狀況。

五十一年「紅旗」第一號社論「鼓足幹勁，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對經濟「調整」政策加以詮釋，指出該項政策具有「承前啓後」之意義，一方面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全部工作，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因而鞏固和發展已經取得之成績，同時又開闢前進之道路，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新水平上向前發展。

依據偽九中全會公報指陳及「紅旗」社論之說明，並證以年來實際「調整」措施，所謂「調整」政策主要意義可歸納為左列各項：

- 一、放緩重工業發展步調，縮小或停止基本建設與設備投資，抑低國民收入分配中積累基金之比重，以改善人民生活情況。
- 二、「國家計劃」中各產業部門之比重順序將過去之重工業、輕工業、農業改為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即先謀克服天然災害之影響，再求恢復一般消費物資之生產，然後再發展重工業，以加速全部經濟之成長。

三、有關經濟體制之改革：

- (一)放寬對「人民公社」之控制，特別在計劃方面，以切合實際存在之客觀可能性。
- (二)下放農業經營權，並予基層單位以較大之自主，以適應農業之特性，「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及社員個人均得為經營之體。
- (三)在集體經濟部份中，縮小按需分配，增加按勞計劃在分配上之比重，物質刺激誘發農民之生產積極性。
- (四)劃分社員自留地，並准許社員家庭私營副業，通過對農民私有意慾之部份滿足，使農民努力增產，以補助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之不足。

(五)開放農村初級市場即集市貿易，以配合私營部份增長之需要。並利商品流通。

前述經濟「調整」政策與體制方面相應之改革，不問其如何說明，顯係在經濟危機重壓之下所採之一時性戰術退却，退却之目的在於阻滯經濟崩潰，進而站穩腳跟，重建平衡，再行徐圖前進。設非「大躍進」帶來生產凋敝之惡果，如「人民公社」能順利推行而不遭遇抗拒與阻礙，經濟高速度成長正為共匪日夕祈求之目標，如何能使其中途自願放棄。

「調整」原係對重工業而言，因其作用及於農、工、商各業，故目前整個經濟均在實施「調整」之中。又「調整」政策雖分為四個項目，而其重心則在「調整」，所謂「鞏固」、「充實」與「提高」不僅未見有何成就跡象，且亦無暇無力顧及，其所以與「調整」同時並舉，主要僅係作為退却之掩飾而已。

共匪「調整」政策之意義俱如上述，茲進而分析產業各部門所存在之問題以明其究竟能否產生起死回生之效。

在「調整」實施之第一年即五十年，匪區經濟依然無何起色。工業生產方面，由於原料不足，資金缺乏，不僅擴充設備之投資減少，即既存設備亦多停工減產，工業產量各方估計不同，但均較四十八年為低，至於提高品質，降低成本，在挖肉補瘡情形下，更不能有所成就。五十年工業產品產量表列如次：

產品名稱	綜合研判產量	依情報資料估 算產量	四十八年產量
生鐵	1,900萬噸	1,300萬噸以下	2,050萬噸
鋼	1,200萬噸	—	1,350萬噸
煤	3,000萬噸	3,000億噸	3,760萬噸
電力	400億度	400億度以下	450億度
原油	390萬噸	390萬噸	370萬噸
水泥	1,000萬噸	1,100萬噸	1,370萬噸
化肥	190萬噸	190萬噸	133萬噸
食用植物油	90萬噸	90萬噸	196萬噸
棉紗	600萬件	190萬件	85萬件
棉布	50億公尺	3.5億公尺	5.5億公尺
機製紙	200萬噸	50萬噸以下	23萬噸
糖	100萬噸	—	23萬噸
膠鞋	—	7,000萬雙	—

農業生產方面，在集中力量支援農業並將農業經營管理體制實行相應改進之下，生產之進展亦未能如共匪之願望，蒙哥馬利將軍曾披露四十九年糧食產量爲三、〇〇〇億斤，並預測五十年可望增至三、二〇〇億斤，共匪在年終時透露，五十年糧食產量亦較上年「好些」，若干專家估計則稱全年糧食產量爲二、二〇〇億斤左右，相距約爲一、〇〇〇億斤。鑒於去年秋收後大陸糧食供應未見增加，本年五月大批難民如潮水般湧入香港，至少足以說明去年糧食產量即有增加，爲量亦必微不足道。至於主要經濟作物棉花與油料則匪自稱均較上年減產。

本年爲實施「調整」政策之第二年，周匪恩來在四月間僞人代會所提出今年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十項任務，依然強調挽救農業，而以爭取糧、棉與油料作物之增產爲當前急務，工業方面僅僅要求合理安排輕重工業之生產，盡可能多增產日用品，並主張進一步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將材料、設備與人力用於急需，即農業之方面。足見共匪對本年工業生產依然調子低沉，態度消極。本年九月僞十中全會公報指出：「支援農業之生產資料，以工業產品爲原料之輕工業產品，不少手工業產品以及某些當前最急需之重要工業品，今年一至八月之產量均較去年同期有較大之增長」，公報對其餘工業產品既無隻字提及，至少可以斷定未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甚或可能已較上年同期減產。農業方面，公報指出：「本年夏季作物實際收穫量比去年略有增加，秋季作物收成亦將較去年增產」。秋收增產尚係一種估計，甚至僅係一種希望，夏季作物既稱略增，按周匪四十八年所稱增產三成爲特大躍進，二成爲大躍進，一成即爲躍進之說，則所增幅度至多不可能達到一〇%、且其所增部份中大多當係自留地所產，不計征購，對於共匪掌握糧食，亦未必有何補益。四十六年大陸糧食產量爲三、七〇〇億斤，人口爲六五、〇〇〇萬左右，其時已發現糧食供應緊張及若干地區發生饑饉情事，本年產量至多僅及四十六年八五%左右，而人口則已增加約五、〇〇〇萬即七·七%，亦即說明本年缺糧數字至少當達七八〇億斤即三、九〇〇萬噸。

匪區經濟目前仍以農業爲重心，「調整」政策實施迄今，農業

共匪經濟之調整「政策」之意義與問題

生產絕未繼續惡化，但亦無明顯好轉之跡象。在農業生產未發展前，工業生產絕無發展之可能。阻礙農業生產發展之原因甚多，其中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爲其最根本之致命原因。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目前雖已較過去放鬆，但基本上依然爲社會主義集體經營，私營部份之比重依然被控制在二〇%以內。既有私營部份之存在，在不斷比較與刺激之下，不僅農民對集體經濟將較前更不感興趣，易言之，即共匪所期求提高勞動生產率之目的將永無實現之可能，而且農民心中亦將醞釀更大與更進一步之願望。目前農村已在流行「土地分到戶，農忙搞互助，農閑自顧自」之要求，足見經濟體制之部份改革並未能使「人民公社」達到進一步之鞏固。目前依集體經濟佔絕對優勢之情況觀察，農業生產至多能恢復至四十六年之產量水平。但其恢復過程，據一般估計，即不遭遇自然災害，至少仍須再經歷三年之時間，即須至五十四年，方能達成。如何能夠渡過此驚濤駭浪之三年，爲目前共黨面臨問題之一方面，另一方面爲即全無安然渡過，屆時人口亦可能增殖至七億以上。在此一壓力之下，農業生產仍將嚴酷限制一般經濟之發展。

本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以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爲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 (二) 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五日截稿。
- (三) 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爲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時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 (四) 來稿請載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時載明。
- (五) 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 (六) 來稿請寄台北市溫州街一三七號本社或台北郵政信箱一八九號。

# 古巴事件所反映的匪俄關係

張棟材

古巴事件所反映出的匪俄對立現象，與以往的空洞論爭，有一個最大的不同之點，是它已把雙方所解釋分歧的「和平共存」與「戰爭不可避免論」兩項問題，在現實面前作了一次最嚴格的考驗。

## 一 引言

在今年三、四月之交，共匪召開偽人代會前後的一段期間，匪俄間的失和僵局似在表面上已有和解的若干跡象。但其後由於偽蒙正式加入共產集團經濟互助委員會，俄南重修舊好之逐漸具體化，俄圖以米格機援印見諸商談等情事連續發生，在在均為對共匪的重大打擊，這顯然可以說明匪俄的對立關係不僅仍在暗中發展，而且隨時都可能演變為再度的公開交惡。所以在俄公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將於九月下旬訪問南斯拉夫後，共匪即於九月十七日起在「人民日報」大肆醜詆狄托，用以間接抨擊赫魯曉夫。到了最近，在古巴事件中更加反映出共匪對赫魯曉夫的反抗已演變正面的辱罵了。

從十月廿二日甘迺迪總統下令封鎖古巴，到赫魯曉夫於廿八日下令拆除古巴飛彈基地，曾被世人稱之為面臨核子大戰的「恐怖的週間」，國際輿論對古巴事件所予今後國際情勢之影響力，都評價甚高，認為它和九年前的史達林之死，五年前的俄第一顆人造衛星之發射，同為轉變東西兩大陣營形勢的轉捩點，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我們也同樣可以從這三個事件的時期劃分中觀察匪俄關係的演

## 變情況。

首先是史達林之死，導致了匪俄雙方矛盾之產生及其逐漸擴大。毛匪澤東竊據大陸後所採取的統治方式如：①以神化史達林竭謀神化其個人權威；②利用秘密警察造成恐怖氣氛，藉以整肅異己，控制人民；③殘酷地剝削農民，以榨取強重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本；這都是標準的史達林手法。但在赫魯曉夫向史達林鞭屍之後，這些手法都被暴露為罪行，使毛匪立即陷於毫無迴旋餘地之窘境，故其與赫魯曉夫之暗鬥殆即種因於此，並亦由此而擴大為匪俄間各種爭執之發端。

其次是蘇俄繼洲際飛彈凌駕美國之後，又於一九五七年十月初發射人造衛星成功後的匪俄關係，當時赫魯曉夫在內政外交及領導共產集團的實力與聲望上均已取得優勢，毛匪見風轉舵，乃藉口參加俄「十月革命」紀念慶典，率領了包括大批軍事、經濟、文化、科學工作人員的代表團再度卑躬朝俄，企圖以第二次的「向俄一面倒」，換得赫魯曉夫歡心與加強援助，所謂「以俄為首」及「東風壓倒西風」的媚俄口號，就是毛匪在莫斯科唱出的。但事後證明毛匪此行完全撲了一場空，因而乃有毛匪於惱羞之餘，於翌年制訂出「大躍進」政策，作出與赫魯曉夫對抗的姿態。其結果則為赫魯曉夫使出了拖延經援，撤退技術人員，迫還舊債等制裁手段，向毛匪

大施壓力。此一情形一直繼續到今天仍在僵持。

共匪於本年九月十七日在匪「人民日報」發表攻擊南斯拉夫社論時，同日並特別轉載了狄托於八月七日對美記者皮爾遜的談話全文作為攻擊的參證，以發洩其對蘇俄之不滿與怨恨。因為狄托在該項談話中曾涉及匪俄關係，指共匪「在國際政治以及國內方面頗為獨立地採取各種行動」，並稱「蘇俄現在正儘量起着一種鎮定作用」。狄托的幾句話，可以說是恰恰道中了匪俄主從關係與失和原由的眞象。

下面，就此次古巴事件來看匪俄關係的化變。共匪在長期對俄積怨中，遇到一個偶然爆發憤怒的機會。

## 二 雙方針鋒相對的論爭

古巴事件發生後，共匪最初極表興奮，雖然在此時期，匪印的邊境戰事已愈演愈烈，但其對內外宣傳，則幾乎全部轉移至「支援古巴反美運動」。共匪興奮的最大理由，正如本年十月間投奔自由的共匪駐瑞典僑大使館安全官趙福，就匪俄關係向西方記者所稱：「毛匪決定政策方針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希望赫魯曉夫與西方國家鬥爭失敗，毛匪便可輕取國際共黨領導權到手。」可是，狡而詐的赫魯曉夫却在緊急關頭突然採取了整個退却的策略，此舉使共匪大失所望，是可想而知的。故在十月廿八日之後，共匪便在煽動宣傳與導演羣衆示威中，由「支援古巴反美運動」一變而為影射與暗示的反對赫魯曉夫出賣古巴運動了。

共匪開始表示其將責難赫魯的信號，是匪「人民日報」在十月卅一日以「保衛古巴革命」為題的一篇社論。共匪以堅決支持「卡斯楚絕不向美強大壓力屈服投降」為辭，烘托出赫魯曉夫是在向美屈服投降。如謂絕不能輕信美保證不進攻古巴的「騙人鬼話」，則等於駁斥並故意拆穿赫魯曉夫在對美妥協中所強調的一點要顧全體面的退路。

十一月內，共匪報紙雜誌與匪管藉古巴事件發出了一連串的對俄指責的叫囂。雖說共匪並未公然指明其所指責的對象是蘇俄，是

古巴事件匪俄所反映的關係

赫魯曉夫，但那種指桑罵槐的語法，只要和阿共霍查公開罵赫的語句，以及美俄為古巴事件的交涉與赫魯曉夫發言內容相對照，任何人都可一看即知其為對赫而發的。例如：

(一)世人均知古巴事件得以脫出核子大戰危機一事，乃為美、俄兩方直接談判之結果，並不容古巴置喙。故共匪特由僑外長陳毅於十一月一日以致古駐平代辦一照會之形式，表示其向美俄兩方抗議稱：「古巴的獨立和主權決不能談判，古巴的自由和權利決不能拿來作交易。古巴的命運掌握在古巴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國家手中。」陳匪更在俄駐平大使館慶祝「十月革命」紀念晚會中（十一月七日）發表露骨地譏諷蘇俄的談話，提出馬列主義對待帝國主義的態度問題說：「究竟是屈辱讓步，犧牲主權，縱容侵略？還是堅持鬥爭，保衛主權，反對侵略？必須有鮮明的立場，而不能有任何含混不清的地方。」

(二)阿共首領霍查曾指名赫魯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者」和「馬列主義的叛徒」（十一月四日在地拉那）。共匪則稱：①現代修正主義已在美帝實力政策面前嚇破了膽，以至墮落成爲帝國主義的義務宣傳員，政治搨客和走狗；②必須堅決地澈底地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見十一月十五日號匪「紅旗」雜誌）。③現代修正主義者背叛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就是迎合美帝國主義的這種需要（見匪黨代表團團長伍修權於十一月八日在保共第八次大會致詞）。

(三)赫魯曉夫對此次和平解決古巴事件，一再稱之為「理智的勝利」，並在「十月革命」紀念節前夕之招待會中坦白稱：「什麼是和乎共存？就是妥協。如果我們欲保衛和平，則我們必須在妥協基礎上造成和平氣氛。」北平匪「大公報」「光明日報」（十一月六日）則稱：「在業已把命運握在自己手裏的古巴人民面前，仍欲搬演另一次慕尼黑的把戲，註定是要完全失敗的。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古巴國內，要想重演聯合國干涉剛果的陰謀，也是註定要完全失敗的。」並稱：「和平只能由鬥爭爭取，而不能賴乞求而得。」

(四)共匪動員大陸各大中城市市民衆舉行支持卡斯楚的示威遊行，其用心顯為通過此種集會非難赫魯曉夫之屈服行爲，並阻撓米高揚之說服卡斯楚工作。俄「真理報」（十一月十八日）刊出馬列主

義研究所所長波諾馬列夫所撰「世界共產主義者之勝利」一文，則斥責「阿爾巴尼亞教條主義者破壞和平共存，任情誣蔑蘇俄，爲可恥而挑釁性的煽動。」此實即爲伊方以斥阿共爲名而對共匪之間接反擊。他如俄共中委兼書記庫西寧在匈牙利共黨第八屆大會中與共匪代表任修權當場舌戰，譏笑阿共爲「吵鬧的局外人，牙尖嘴利，而在實際上沒有一點辦法可以幫忙古巴」。其所稱「吵鬧人不能追隨馬列主義」等數語，尤爲對共匪之強硬並含有侮辱性之總答覆。

### 三 匪古與俄古關係之比較

今年十月間，拉丁美洲外長會議曾宣佈匪俄之共同干涉古巴，係基於將古巴變爲軍事基地，以利共黨滲入美洲之企圖；甘迺迪總統於此次對古巴之聲明中，亦特別將共匪與蘇俄並列，謂其與俄聯合在古巴裝置進攻性軍事設備，故對危害和平，亦應負咎。這都是正確的認識和定論。共匪的對外活動，原是一向以依靠蘇俄實力爲背景而與俄同惡相濟的，其能向古巴滲透，事實上也是在俄打通與古巴卡斯特政權關係之後才能接踵而來的。不過，由於赫毛衝突之日益加深，匪俄間的對立隨而愈形廣泛，故凡匪俄勢力並在地區，亦常常是雙方的暗鬥場。此次赫魯曉夫派米高揚專程前往古巴，其主要任務固爲對卡斯特之勸導與懷柔，但國際間亦盛傳米某之另一任務即爲預防卡斯特向共匪一面倒而成爲西半球的阿爾巴尼亞。觀乎共匪大力聲援卡斯特反妥協的煽動宣傳與羣衆工作，米高揚之長期滯留古巴（達廿三日），以及卡斯特最初向宇譚表示對俄決定拆除飛彈基地的憤慨，此說亦絕非捕風捉影之談。同時，我們在匪古與俄古關係的比較上，也可看出一些線索來。

卡斯特政權之能以存在並逐漸強化，主要的當然是靠蘇俄的軍援與經援。但共匪在對古援助方面，除軍援無法與擁有核武器蘇俄相較短長外，其在經援與貿易上則並不太遜於俄。如俄對古之貸款爲二億美元，共匪貸與古者則爲六千萬美元；最初共匪購買古糖額，規定爲每年五十萬噸，旋於一九六〇年一月又改爲同於蘇俄購額的一百萬噸。至於匪俄對卡政權在思想理論指導上的影響力何者

爲強，共匪似更抱有相當自信。這裏可以舉出幾項值得注意的事實：

(一) 卡斯特和毛匪澤東有許多相似點：兩人都是以山地爲武裝叛亂根據地，並裹脅農民以游擊戰由農村包圍城市而奪取得政權。毛匪說過「槍桿子出政權」，卡斯特則稱：「人民運動就是掌握武器，沒有此條件就會被出賣被消滅」。

(二) 卡斯特的最親信戰友如多爾蒂科斯（現任總統）、格拉瓦（現任工業部長）、羅德里格斯（現任土地改革全國委員會主席）等都訪問過共匪，他們推崇共匪經驗與成就，且將毛匪視爲馬列主義正統思想的繼承者，並將其與史達林並列，却並未提及赫魯曉夫的名字。在古巴譯印的毛澤東選集，已銷售到廿五萬冊以上。

(三) 古巴在全國各地合作社、工廠、學校成立民兵組織，已建立起一百萬民兵。此一組織自始即係接受共匪「人民公社」之「全民皆兵」訓練方式，作爲正規軍之輔助部隊。共匪對民兵的教育內容係以仇外反美爲重點，古巴更是以反美爲主。

(四) 卡斯特曾極力反對在黨內討論反對史達林「個人崇拜」問題，會將所謂「個人崇拜」與「領導人威信和權威」區分爲兩種毫不相干的問題，認爲「對一個蘇聯的問題」不必討論，「討論這個問題已經在羣衆中造成混亂，把他們引入歧途」。此點與毛匪之反赫立場相同，匪報（見一九六一年三月廿九日匪「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之用意亦即在此。

以上所舉，足以證明匪古關係之密切程度決不弱於俄古關係。蘇俄誠然擁有強大武力足以維繫古巴對俄靠攏之向心力，但此次俄拆除古巴飛彈基地及撤離轟炸機行動，徹底暴露了卡斯特毫無決定權的地位，而只是充當任俄擺弄的傀儡角色。所以，連一向在古巴問題上都是採取反美態度的拉丁美洲國家墨西哥、阿根廷，都在此次古巴事件中完全保持緘默，不齒卡斯特之所爲。因是，人們便不免假想到：卡斯特爲挽回「面子」，是不是也會有爲共匪煽動所惑而不甘受俄控制之可能情形出現？蘇俄對毛匪所能給予卡斯特的心理影響，一定已在開始警戒。

## 四 結 語

古巴事件所反映出的匪俄對立現象，與以往的空洞論爭，有一個最大的不同之點，是它已把雙方所解釋分歧的「和平共存」與「戰爭可避免論」兩項問題，在現實面前作了一次最嚴格的考驗。波諾馬列夫在他那篇「共產主義者之勝利」（見上述）一文中的結論，主要的也就是強調了這一點。

蘇俄認為它在古巴事件中的決策是「賢明」與「勝利」；相反地，共匪則指其為屈辱的投降，這也就是說毛匪依然頑強地不肯向赫魯曉夫認輸；雖然，在共產集團附和他此一論調的僅有阿爾巴尼亞和北韓。匪俄間之對立衝突，在基本上是赫毛之權力鬥爭。故匪俄間之真正和解，當取決於赫毛權力鬥爭之結束，此即為必須有一

# 緬甸政局現貌

吳 越

## 一 二次政變與革命委員會

緬甸聯邦自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脫離英國統治宣佈獨立，十餘年來，由於外受中共窺伺顛覆的威脅，內部則因黨派傾軋，邊區少數民族的離異，緬共及叛軍的長年禍亂，經濟情況日形窮蹙。在宇汝內閣執政期間，投機媚共，標榜中立，政局屢陷於混亂，致發生兩次政變。第一次政變發生於一九五八年九月，由國防軍總參謀長尼溫將軍(Ni Win)領導軍人集團發動不流血政變，組織軍人政府，實施軍政統治，在其執政十八個月期間，獲得緬甸反共黨派及自由同盟「鞏固派」(“Sable Faction” AFPFL)的支持，政局相當穩定。至一九六〇年一月緬甸舉行大選，四月一日第三屆新國會成立，尼溫當即還政民選政府，由緬甸聯邦黨(其前身即自由同盟「廉潔派」“Clean Faction” AFPFL)執政，組成宇汝內閣，兩年來，宇汝因無法協調軍政，加以執政黨內部分裂內鬩、緬共叛軍拒絕

方出於無條件降伏之具體行動表現。赫魯曉夫於去年俄共第廿二次大會中曾提出過要阿共首領霍查下台的要求，赫魔的本意便是向毛匪作間接的暗示。最近保共實行整肅史達林主義殘餘份子尤科夫等人，可以說是赫魯曉夫指給毛匪表現具體行動的最新事例。

在赫毛鬥爭未結束之前，雙方的相互抨擊，必然會在各自認為與己有利情勢之事端中，互向對方作間歇性之發難。現狄托傳已定於下月訪俄，這自然又是共匪謾罵「現代修正主義」的機會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現已成為匪俄雙方的出氣筒和射擊靶，雙方都有一個隨時可用的洩憤對象，都頗便利。所以貝爾格萊特和地拉那，也都成了觀測匪俄關係的氣象站。同時，也許正因有南、阿的存在，反而起了緩和匪俄趨向分裂的作用。

和談，發動叛亂，邊區民族離合紛爭，經濟情況繼續惡化，遂使緬甸政局益增動盪。至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仍由尼溫將軍再度領導軍人集團發動政變，拘禁總統宇溫貌、總理宇汝、全體閣員及第一任總統蘇瑞泰各邦區議員等五十三人。

政變後，由軍人集團指派委員十七人，成立「緬甸國家革命委員會」接管政權，組織緬甸國家政府(尼溫出國期間，革命委員會於八月十四日公佈修改機關名稱，改稱為「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和「緬甸聯邦政府」)。由尼溫擔任革命委員會主席，同時解散國會，停止憲法行使，以革命委員會為行使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另組織新內閣(閣員八人，除外交部部長宇智漢外，其餘翁基准將 Brigade Aung Gyi、陣帕准將 Brigadier Tin Pe 等七人均係陸海軍將領。)

代表政府行使政權，新政府并以緬甸的行政和立法大權，賦予革命委員會主席，俾能貫徹推行挽救政治危機及經濟惡化的庶政。

尼溫將軍雖然先後兩度領導軍人集團發動政變，獲得緬甸聯邦

的政權，但是經過九個月來的演變，始終未能鞏固其個人的領導地位；即擁有軍事實權的軍人集團亦未能有效的穩定緬甸的政局。經過半年來的醞釀，革命委員會已提出「緬甸社會主義路線」(Burmese Way to Socialism)的新政綱，并已着手組織「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 簡稱 BSSPP)，致力使經濟落後的緬甸走向社會主義，但其潛在的內部危機和矛盾隨着擴大，勢將導致緬甸聯邦重陷於混亂的局面。

## 二 「社會主義路線」政綱

當革命政府成立時，對外宣佈繼續採取中立外交政策，接受東西雙方無條件的經濟援助，同時闡明新政府的經濟政策將暫緩實施宇汝內閣所頒佈的「國營貿易政策」，着重農業開發。自三月中旬開始着手制訂革命政府新政綱，終於在四月廿八日經革命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一項「緬甸社會主義路線」——聯邦革命委員會政綱立場書，其主要內容為：

- (一) 聯邦革命委員會認為惟有建立合法平等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始能解放各民族及國民的窮困生活，因此革命政府決心與國民攜手，共同走向社會主義路線。
- (二) 緬甸聯邦對世界事務的基本立場，無論面臨任何困難，決不放棄國家民族利益，而慎重避免左右勢力操縱。
- (三) 在國家民族的利益前提之下，建立「人人參加，公平享受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將生產力和生產資源與生產資料統一於「生產力」的範疇下，以國家所有制和團體所有制作為其生產關係，用「各盡所能，按勞給值」，來調節分配，實行社會主義計劃，擴大生產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
- (四) 強調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建立保護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撤銷現有的官僚主義行政機關，建立社會主義的行政機關和保衛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國防軍。
- (五) 由於經濟落後，在過渡時期准許能幫助提高國家生產力的國民私營經濟企業的存在；而在完全過渡到社會主義時，

將不排除忠於人民利益的民族資本。

- (六) 對於困擾緬甸聯邦的民族問題，則強調加強各民族的團結；但新政綱對於羣衆組織，則強調要以佔國家人口多數的農民和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為其主力。
- 新政綱發表後，革命委員會主席尼溫將軍當即於五月七日接見三大政黨——「緬甸聯邦黨」(PSU)前身即自由同盟「廉潔派」(“Clean” Faction AFPFL)、「自由同盟」(AFPFL)即「鞏固派」(“Stable” Faction)，民族團結陣線「(National United Front 簡稱 NUF)——領導人，說明革命委員會所提出的「緬甸社會主義路線」的基本政策和立場，祇要各政黨不違背新政綱的原則，任何建議，新政府將予誠意採納。同時盼望各政黨將新政綱在各黨派內各階層提付討論。經過各政黨的領導階層研討後，表面上雖對新政綱的精神表示支持，事實上各黨的意見則極不一致：

- (一) 聯邦黨方面——認為緬甸聯邦採用國會民主制度，實行社會主義固然得不到預期的效果，而現在以努力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其基本原则亦應慎重考慮。
- (二) 自由同盟方面——內部意見亦發生紛歧，宇巴瑞所領導的一派認為取消國會民主制度是正確的，新政綱正符合當前緬甸的實際要求，故主張全力支持；但宇叫迎所領導的左傾份子則表示不能同意取消國會民主制度，并且認為革命委員會所執行的政策，是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 (三) 民族團結陣線方面——因為該陣線原非政黨，而祇是結合主張相同、意識相同的政治團體而組成的統一戰線，係屬左傾政團，對新政綱自然表示熱烈支持。
- (四) 緬共方面——白旗緬共已針對新政綱發表文告，公開抨擊新政府是資本主義政府，并且強調將加強聯繫吉仁叛軍，加強反軍政府的組織，建立所謂民族民主統一戰線的緬甸政府。

## 三 從聯合政黨到一黨專政

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公佈「緬甸社會主義路線」新政綱後的次一



重要措施，便是醞釀組織一個聯合統一的緬甸政黨，來執行工作。尼溫將軍先於五月八日、十一日、十七日三度接見三大政黨領袖時，表示革命政府的願望，將竭力爭取自由「緬甸聯邦黨」、「自由同盟」和「民族團結陣線」三大政黨，組成一個統一陣線的聯合政黨，而不是各政黨的統一陣線。革命委員會認為在爭取實現組織統一政黨時，可以以政黨或個人為單位加入，並且進一步表示，革命委員會堅決努力朝着社會主義的目標，推行工作，共同擬訂一部社會主義憲法。

革命委員會宣佈組織聯合政黨後，三大政黨的反應除了民族團結陣線外，其他兩大政黨的反應頗為冷淡：

(一)緬甸聯邦黨——因為該黨重要主持人宇汝、德欽陣等尚在革命政府拘禁中，聯邦黨總部在副主席德欽班棉主持之下於五月十二日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除了決議支持「社會主義路線」，並表示對目前以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代替國會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應加考慮外，對於組織聯合政黨，認為須待該黨研究後，才能作最後決定。

(二)自由同盟——該盟總部於五月九日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組織聯合政黨問題，因左右兩派份子意見分歧，無法獲致決定。至五月十七日尼溫將軍再度接見各大政黨領袖時，才由宇巴瑞表示自由同盟將與革命委員會合作。但不同意組織聯合政黨，宇巴瑞認為將不同意見份子混在一個政黨，勢必導致分裂，不如組織一個政黨或尋覓其他途徑來推行「社會主義路線」的政策，並建議新政府在適當時期內，舉行民意選舉。

(三)民族團結陣線——表示應先將現有政黨組成聯合陣線，然後進一步洽商組織一個政黨，並建議聯邦革命委員會組織一個由尼溫將軍擔任主席及由各政黨參加的顧問委員會來推行。

由於各政黨的反應不一，而革命委員會基於其本身的政治要求，終於在籌組聯合政黨的種種努力失敗之後，於七月四日公佈組織統一政黨的告和「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綱黨章」。聲明中指出：

### 緬甸政局現貌

(一)革命政府堅信「緬甸社會主義路線」政綱，是惟一能够重建緬甸聯邦的實際計劃。

(二)推行新政綱，必須要成立一個適宜的政治組織來與人民攜手進行實現政綱的工作。

(三)革命政府在過去曾經三度與現有各政黨領袖會商組織聯合政黨，但各政黨領袖對共同合作組織統一政黨一節，有不同的意見，遂妨礙了革命政府為挽救緬甸衰落的政治聲望所作的努力。

(四)革命政府認為組織統一政黨，不能一蹴而至，同時具有分歧政見的各政黨份子也不能在剛加入統一政黨後即可付予任務。基於上述因素，革命政府認為須有較充份的時間來組織這個政黨，同時要採取重質不重量原則，乃決定以二年為期，先將這個單一政黨的組織工作，限於選訓幹部的階段上。

從聲明中可以看出，革命委員會的建黨步驟是很慎重的，其目標是先建立基層幹部，予以訓練培養，二年後再由此核心擴大組織，成為正式政黨。七月六日革命政府根據黨章第三條規定——緬甸革命委員會應組織同等地位的三個委員會：(一)黨組織中央委員會(The Central Organizing Committee)，(二)黨紀律維護委員會(The Party Discipline Committee)，(三)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委員會(The Socialist Economy Planning Committee)。一委任尼溫為黨組織中央委員會主席，索敏上校(Col. Saw Myint)為秘書，翁基准將(Brigadier Aung Gyi)，陣帕准將(Brigadier Tin Pe)，丹盛上校(Col. Than Sein)，叫梭上校(Col. Kyaw Soe)等任委員。紀律委員會亦由尼溫任主席，山友准將(Brigadier San Yu)，盛溫准將(Brigadier Soan Win)，沙漠上校(Col. Hia Han)，七敏上校(Col. Chit Myaing)等任委員。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委員會尚未委任，至此建黨的高層組織已粗具規模。

新黨黨綱和黨章公佈後，緬甸各報輿論的反應大都表示支持，僉認新政黨重質不重量，一般投機份子想藉參加新黨謀取政治利益的企圖必告失敗，而革命政府此舉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革命政府有

條件的遷政於民，軍人不願干涉政治，其目的祇是組織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組織來領導人民，挽救與重建緬甸聯邦。但是新政黨的組織，并不表示將與其他政黨共存，質言之，在「緬甸社會主義路線」政綱中，已指出緬甸以後將實行一黨制。因此各政黨的反應頗值得注意：

(一)緬甸聯邦黨——該黨執行委員會已通過，聯邦黨黨員在退出該黨後可自由參加新黨(BSPP)，但聯邦黨不予解散。該黨現任秘書長德欽叫吞(Thokin Kgaoo Dun)已與黨內其他三名高級領袖宣佈脫黨加入新黨，但大多數執行委員仍繼續留在聯邦黨內。附屬於聯邦黨的「農民組織」(All Burma Peasants' Organization)則宣佈解散，會員可自由加入新黨。

(二)自由同盟——該黨自始而反對統一政黨，故對新黨反應冷淡，雖然已有中委宇七丹吞、宇盛拉、宇登貌等幾十名領袖退出準備加入新黨，但高層領袖沒有變動的表示。

(三)民族團結陣線——該陣線主要的兩大成員，一個是「緬甸勞工黨」(The Burma Workers Party 簡稱 BWP)，一個是「人民同志黨」(The People Comrade Party 簡稱 PCP)，目前已有二級領袖辭職，準備加入新黨，如勞工黨中委宇巴迎等八人即已參加，宇巴迎且已被任命為財政顧問，但原先表示全力支持組織統一政黨的高級領袖則因對黨章尚有甚多未能明瞭之處，而且鑑於新黨黨章規定過於嚴格，而感到猶豫不決。

緬甸政壇上三個主要政黨對新黨的反應，有些自始即表示反對，有些首先表示支持，後來看到黨章嚴格而生猶豫；但有一點相同的意見，即革命政府如不正式宣佈實行獨一政黨制，則三大政黨將與新黨共同存在，而各黨黨員的是否參加新黨，則可由黨員自行選擇。目前的趨勢，各政黨所屬的職業團體和地方黨部基於其自身的現實利益，已有脫黨參加新黨，希望能獲得工作機會，如脫黨份子繼續增加，勢將導致三黨的內部分裂，甚至瓦解。

緬甸革命政府走向「社會主義路線」，其今後的政治動向極堪

注意：

(一)「緬甸社會主義路線」的目標及其立場與新黨黨綱所規定的黨的形式、黨的路線，幾乎完全採用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和現行政策，不難窺見緬甸今後推行的社會主義，已經脫離了社會政策的範疇，而走向左傾政黨集權的道路。

(二)緬甸聯邦的經濟，目前還停滯在落後的階段，新政綱關於所謂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各項政策，在在顯示強烈的集體經濟的本質，此種制度顯然忽視落後國家的經濟特質及自由經濟對現代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今後在實施過程中，極易招致嚴重的混亂和失調，而為緬共製造有利的條件和機會。

(三)革命委員會組織獨一政黨，削弱現有其他政黨的力量和貶低其地位，使新黨在軍權和政權的支持下，成為最強大的政黨，來鞏固現有的政權，繼續掌握緬甸聯邦的政治。雖然革命政府聲明將有條件的遷政於民，所謂有條件乃指未來統治權的組織，必須是革命委員會所指揮的組織；換言之，未來的聯邦將造成軍人獨裁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由革命委員會這些措施，不難窺見緬甸軍人集團重握政權後，顯然不同於一九五八年九月間的第一次政變，祇是運用軍人的力量，來安定動亂的政局，而是有計劃有目標為長久掌握政權作深遠的打算。

#### 四 緬甸政局及其危機

軍人集團領導下的革命委員會現正企圖將緬甸聯邦導向「社會主義路線」，但是一個新政權的作為需要相當的環境與條件，最低限度必須革命政府已經能够確切掌握全面的統治權，而其社會經濟各方面也已有了相當的基礎，尤其重要的，統治階層沒有太大的紛歧思想而且具有高度的團結力量與政治抱負；否則，儘管提出「社會主義路線」的政治號召，對當前緬甸的紛亂政局並沒有裨助。

九個月來緬甸政府內在所潛藏的政治危機，極為錯綜複雜，革

命委員會主席尼溫將軍深受困惱，不得不於七月初仰光大學事件後，悄然於七月十四日以療治宿疾爲藉口出國，事實上尼溫已自知其領導地位業經動搖，而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如革命委員會軍人集團的分裂，邊區少數民族的離異，財政窮窘，以及各黨派的不合作，這些問題絕非其所能協調而作有效的處理。

(一)尼溫再度掌握大權後，憑其個人經驗，深知國家百孔千瘡，政治千頭萬緒，外交波詭雲譎，未必可以單憑軍人而執政，故不得不在革命委員會以外羅致一批比較超然的政治人士來充任政治顧問，但是所羅致的所謂超然黨派顧問團，恰是一批左傾政客，所謂「社會主義路線」，中立外交政策，便是出於這輩「智囊團」之手。由於尼溫左右受左傾份子的操縱，遂引起軍人集團內部的不滿和對立。就革命委員會領導階層而言：①尼溫嫡系的軍人有山友准將(Brigadier Sau yu)軍事情報部長帽倫中校等實力派。②以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兼貿易工業部長翁基准將爲首的一派，擁有宣傳部長素敏上校(Col. Saw Myint)、內政部長哥梭下校(Col. Kyaw Soe)及社會主義路線黨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丹盛上校(Col. Than Sein)等，此派現爲緬甸聯邦政府具有實力的控制者，翁基准將在政治上得自由同盟宇巴瑞的支持，甚至將來舉行大選時，此派支持宇巴瑞執政亦極可能。③以農林部長陣帕准將(Brigadier Tin Pe)爲首的一派與帽倫中校合作，暗中勾結宇汝派份子，與翁基展開鬥爭。上述軍人集團派系傾軋，到了七月中旬已至白熱化，迫使尼溫不得不將政權交由翁基代理，軍事亦交由翁基掌握，設置「軍務糾察小組」，由叫梭上校、素敏上校、丹盛上校等分任正副組長，原任軍事情報部長帽倫中校亦由丹盛上校瓜代，帽倫只好隨同尼溫出國。尼溫在英倫檢查身體發現鼻癌，基於健康及政治的關係返國後名義上雖仍然是革命委員會主席，但其領袖地位顯已動搖。現在實際掌握緬甸政權的乃是以翁基准將爲首的軍人集團。

(二)緬甸聯邦係多民族國家，人口一千九百八十五萬，其中緬族佔一千萬左右，其餘爲珊族、吉仁、卡欽、欽族、卡瓦、汝族等。在英治時代，採取分治制度，緬甸政府管轄緬族，邊區各邦分設政府，由緬甸總督直接管制，實際上由各族土司統治，各民族相互

仇視，時起衝突，此係英國分而治之的政策。一九四七年緬甸獨立後，政權由緬甸執掌，民族糾紛益形劇烈，邊區各邦要求自治，一九六一年六月間由珊族邀集各民族代表在珊邦首府東枝召開會議，提出自治，要求政府修改憲法成立「聯合邦」，宇汝內閣未予同意，於是叛亂時起，迄無寧日。本年三月二日政變後，革命委員會採取斷然手段，拘禁各邦區議員，宣佈取消各邦區事務所，成立最高委員會行使各邦區政權，因此激起各邦區民族的反抗，珊邦控制卡瓦山區，卡欽控制緬北八莫、密支那擴大叛亂，而中共匪幫亦乘機滲透各族與波助瀾，擴大緬甸的內亂。緬甸少數民族的叛亂已使國防軍深感困擾。這些內政上的困難問題自非革命委員會單憑武力所能解決。

(三)由於長久的政治混亂，使緬甸經濟日形萎縮，連帶影響國家財政收入。根據六月間緬甸聯邦銀行董事會向革命委員會提出的經濟報告，指出一九六二年全緬米產量由於減少耕種一千五百英畝土地，減產百分之三點四，本年米輸出預計只有一百二十萬噸，減少百分之二十四，在貿易方面一九六一年出口總額減少九千四百萬緬幣，入口亦較上年減少一億四千五百萬緬幣，入超達七千五百萬緬幣，物價上漲百分之三三點二，經濟萎縮正在繼續惡化中，斷非採取國營貿易政策所能挽救，因此聯邦政府雖然強調中立主義，不接受有條件的援助，事實上新政府仍然依賴外援的支持。

此外，成爲聯邦政府最大威脅的是中共匪幫的滲透顛覆，及在匪俄全力支撐之下的緬共叛亂。多年來匪緬關係的演變，共匪的基本策略始終隨着對印度的政策而採取不同的手段，當匪印關係惡化時，對緬採取懷柔政策，反之，匪印關係緩和時，對緬即採取脅迫政策。一九六〇年一月匪緬簽訂「邊界協定」，同年十一月宇汝簽准換文，共匪不惜冒賣國行爲之大不韙承認「麥克馬洪線」綫段，而換取緬境的卡瓦山區，其陰謀即企圖以高屋建瓴之勢，控制珊邦心臟地帶，準備在中南半島形勢轉變時，問鼎緬甸囊括東南亞。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如妄想以走向「社會主義路線」的左傾姿態繼續媚共，非但無法解救其內在的政治經濟危機，且將危及自身乃至整個東南亞的安全。